



# 未结束的革命

俄国，1917—1967

〔英国〕伊萨克·多伊彻

Sovietlije 译

未结束的革命  
俄国 1917-1967

伊萨克·多伊彻

1967年1-3月发表于  
剑桥大学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

## 目 录

译者说明 .....	I
致 谢 .....	1
I. 历史远景 .....	2
II. 革命持续性中的断裂 .....	15
III. 社会结构 .....	28
IV. 阶级斗争中的僵局 .....	40
V. 苏联与中国革命 .....	53
VI. 总结与展望 .....	64

## 译者说明

据《未结束的革命，俄国，1917—1967》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Deutscher, Isaac,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译出，某些地方参考了该书的俄译本。书中脚注，除标明“多伊彻注”者之外，均为译者注。

## 致 谢

这里出版的是 1967 年 1-3 月间在剑桥大学所作的讲座。在剑桥期间，异常认真的听众、特里维廉讲师遴选人以及尤其彼得学院院长和基督学院院长、副院长和院士们<sup>1</sup>的热忱回应，对我来讲是弥足珍贵的记忆。

对于在这六次讲演中，如何处理半个世纪里苏维埃历史庞然复杂的问题，我从我妻子那里受益良多。她帮我厘清了这次考察的困难之处；读者必将发现的错误则完全是由我造成的。我很感激友人伊·弗·查·吕多维克教授<sup>2</sup>的批判性理解以及阅读讲演稿时的耐心；对于约翰·贝尔先生和丹·马·达文先生<sup>3</sup>颇有助益的改进建议，我深表谢意。

伦敦

伊·多

1967 年 3 月

---

<sup>1</sup> 这里的“院士”（fellow）不同于科学院的“院士”头衔，而是指学院中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一般教师。

<sup>2</sup> 伊夫林·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吕多维克（Evelyn Frederick Charles Ludowyk, 1906-1985），荷兰裔英国学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吕多维克夫妇与多伊彻夫妇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sup>3</sup> 丹尼尔·马库斯·达文（Daniel Marcus Davin, 1913-1990），新西兰裔英国作家。

## I. 历史远景

对于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时代来说，俄国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这场革命是否满足了它所激起的希望？自从沙皇国垮台和首届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如今自然应当重新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与这些事件之间的距离似乎遥远到足以产生一种历史远景。即便如此，这种距离很可能还是太短了。这是现代史上最为丰富、最为动荡的纪元。俄国革命把问题变得更为深入，把冲突搅得更为激烈，释放出了比过去最伟大的社会变动所涉及的力量都巨大得多的力量。并且这场革命决没有终结。它还在进行着。它或许仍然会用剧烈而突然的转向令我们震惊。它仍然能够重新绘制自己的远景。我们正在进入史学家们要么害怕涉足要么害怕地涉足的领域。

首先，我们都承认这一事实：如今的苏联统治者把自己描述成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后裔。然而这种情况很难为人接受。在现代革命当中，没有任何先例可与俄国的变动相提并论。它们都没有持续半个世纪。它们都没有在政治机构、经济政策、立法行为和意识形态传统上保持类似的相对持续性。只用想想查理一世被处决五十余年后英国的面貌。到那时已历经共和国、护国制和复辟，并将光荣革命抛诸身后的英国人民，在威廉和玛丽<sup>1</sup>统治时期，竭力排斥甚至忘却所有这些丰富而激烈的经验。而在捣毁巴士底狱后的五十年里，推翻了旧君主制的法国人经历了雅各宾共和国、热月、执政府和帝国；目睹了波旁家族的回归，并再次将他们推翻，以便加冕路易·菲利普，后者的资产阶级王国到 1830 年代末就耗尽了半数阳寿——1848 年革命已隐然在前。

由于持续已久，俄国革命似乎不可能重复这种经典的历史循环。俄国召回罗曼诺夫家族，即便只是为了再次推翻他们，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俄国土地贵族像复辟时期的法国人那样，回来索要庄园或者对剥夺庄园的补偿。法国大地主仅仅流亡了二十余年；可等他们归来时，国家已经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以至自己成了陌生人，无法重拾旧日的荣光。1917 年后流亡的俄国地主和

---

<sup>1</sup> 光荣革命后的 1689-1694 年间，威廉三世和其妻子玛丽二世双王共治，从而开启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资本家已经绝迹了；如今他们的子子孙孙肯定即便在梦中也必须放弃自己的祖产。在后来以公有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工业中，他们父辈或祖父辈曾拥有的工厂和矿场只占一小部分。革命似乎比一切可能的复辟动因都存在得更为长久。不仅旧制度<sup>1</sup>的各党，而且曾在1917年二月和十月之间主导政治舞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甚至在流亡者中间，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消失已久了。只有那个在十月起义中获胜的党，经受住了所有的权力变换，统治着这个国家，炫耀着1917年的旗帜和符号。

可它还是同一个党吗？我们真的能够谈论这场革命的持续性吗？苏维埃官方意识形态家们宣称，持续性从来没有被打断。其他人则说，它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一种掩盖现实的、完全不同于1917年雄心壮志的意识形态外壳而被保留下来。在我看来，真相似乎比这些相互冲突的说法更为复杂难明。不过让我们姑且假定持续性仅是一种表象。我们仍然需要问一问，苏联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附着于它？一种没有任何相应内容的空洞形式，怎么能够持续如此之久？当后继的苏联领导人和统治者一再声称追随革命的初衷时，我们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他们的声明；但也不能把它们当成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不屑一顾。

在这里，历史先例又是富有教益的。在法国，在与1789年的类似间距中，执政者并没有把自己表现为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后裔。法国几乎忘掉了雅各宾主义在她的际遇中曾起过的、巨大的创造性作用——她只记得，雅各宾主义是大恐怖时期站在断头台背后的魔鬼。只有一些像邦纳罗蒂<sup>2</sup>（他自己就是大恐怖的受害者）这样的社会主义空想家，才努力给雅各宾传统平反。英国曾经长久地憎恨一切克伦威尔和圣徒们<sup>3</sup>主张过的东西。乔·麦·特里维廉<sup>4</sup>（我在此对他卓越的史学工作表示敬意）描述了这种“否定的热忱”如何甚至在安妮女王<sup>5</sup>统治时期影响英国人的头脑。他说，自复辟末期以来，重又兴起了对罗马的恐惧<sup>6</sup>；而“五十年前的事件造成了一种对清教主义的报复性恐惧。推翻教会和贵族制、斩

---

<sup>1</sup> 原文为法文“*ancien régime*”。黑体原文为斜体，下同。

<sup>2</sup> 菲利波·邦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1761-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原为意大利人，后参加法国大革命。起初追随罗伯斯庇尔，担任国民公会特派员。期间，触犯大地主利益，遂于热月反动期间被捕下狱。在狱中结识巴贝夫后，成为其追随者，为“平等派密谋”核心成员之一。后因此于1796年再次被捕，次年被流放。结束流放回国后，整理出版《为平等而密谋》一书。由于是被热月派控制的救国委员会逮捕的，因此严格来讲，邦纳罗蒂并不能算大恐怖的受害者。

<sup>3</sup> 即小议会议员。小议会是克伦威尔在其统治时期审查任命的议会。

<sup>4</sup>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英国辉格派史学家。旧译“屈维廉”。

<sup>5</sup> 威廉三世去世后，安妮女王继承王位，在1702-1714年间统治英国。

<sup>6</sup> 光荣革命的原因之一即是詹姆斯二世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和罗马教廷的统治。

首国王以及圣徒们的严峻统治所留下的消极印象，如同对‘血腥玛丽’<sup>1</sup>和詹姆斯二世<sup>2</sup>的记忆那样可怕而永恒”。特里维廉认为，这一事实表现了反清教反动的力量：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保王党和圣公会的内战观占据主导地位；辉格党人私下里嘲笑它，但在公共场合只敢偶尔反驳它”<sup>3</sup>。确实，托利党和辉格党继续争论着“革命”；不过他们所争论的是1688-1689年而非1640年代的事件。英国人开始改变他们对于大叛乱的看法，并且更为尊重地将其视为一场革命，还要等到两个世纪之后；并且甚至要过更长时间，克伦威尔的雕像才能被树立在下议院前面。

俄国人仍然带着半宗教式的崇敬，日复一日地涌入红场的列宁墓。在他们拒绝承认斯大林并将他从陵墓中移出时，他们并没有像英国人将克伦威尔分尸和法国人对待马拉那样，粉碎他的遗骸；他们默默地将他重新埋葬于克里姆林宫的英雄墙<sup>4</sup>下。当他的后继者决定放弃他的部分遗产时，他们声称要回归革命的精神泉源、回归列宁的原则和理念。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古怪的、对仪式的东方式执着，但其下却奔涌着持续性的劲流。革命的遗产在社会结构和国民思想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来。

当然，即便在历史中，时间也是相对的；半个世纪或许意义重大或许不值一提。持续性也是相对的。它或许是——它确实是——半真半幻的。它的基础是牢固的，但它自身却是脆弱的。它得到了伟大的祝福，但也遭受了诅咒。无论如何，在革命持续性的框架中，发生了严重的断裂，这一点我想晚些时候再考察。不过框架是足够宏大的；并且没有哪位严肃的史学家在对待这场革命时，能够掩盖它或者对之无动于衷。他不能将这半个世纪里的事件看做一种历史差错，或者一些坏人恶毒设计的结果。我们所面对的是一部分巨大而动荡的客观历史现实、一种人的社会经验的有机发展、我们时代视野的大幅扩展。当然，我主要是指十月革命的创造性工作，并对此无愧于心。1917年二月革命在历史中的地位仅在于十月的序幕。我这一代人已经目睹过许多场这样的“二月革命”；我们在1918年，

---

<sup>1</sup> 指1553-1558年统治英国的玛丽一世。其统治期间，破坏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成果，大肆屠戮新教徒，故称“血腥玛丽”。

<sup>2</sup> 詹姆斯二世于1685-1688年统治英国，其间企图恢复封建专制、扶持天主教势力。故此，在光荣革命中被推翻。

<sup>3</sup> 乔·麦·特里维廉：《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布伦海姆》，第3章。——多伊彻注

<sup>4</sup> 原文如此，指克宫尼古尔斯基塔和救世主塔之间的宫墙。这里埋葬了许多革命和内战期间的布党烈士和苏联领导人，故此获得了“社员墙”的绰号。或因此，多伊彻在此称其为“英雄墙”。

在俄国之外的国家里——在德国、奥地利和波兰见识过它们，那时霍亨索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自己的王冠。可如今谁会把 1918 年德国革命说成是本世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并未触动旧社会秩序，并且只是纳粹主义当道的序幕。如果俄国也停留于二月革命，并在 1917 或 1918 年创造出俄国版的魏玛共和国——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设想我们今天会记得十月革命？

然而不少理论家和史学家仍将十月革命视为一次近乎偶然的事件。一些人争辩道，只要沙皇不那么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绝对专权，并且如果他向忠诚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做出让步，那么俄国很可能免于发生革命。另一些人则说，如果俄国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在因战败而陷入混乱和毁灭之前及时退出一战，那么布尔什维克绝不会得到他们的机会。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缘于沙皇和他的顾问们、或者沙皇倒台后紧接着的掌权者的错误和失算；而我们被要求去相信，这些错误和失算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是个人判断或决策的事故。当然，沙皇和他的顾问们确实犯过许多愚蠢的错误。但他们是在沙俄官僚集团以及投资君主制的有产阶级的压力下，犯下这些错误的。二月政权的历届政府，李沃夫亲王政府<sup>1</sup>和克伦茨基政府，也不是独立自主的。它们让俄国继续参战，因为它们像沙皇政府那样，依赖于国内外大金融资本中心，而后者坚持俄国应当作为协约国一员参战到底。“错误和失算”有其社会条件。战争也确实严重地暴露和加剧了旧制度的致命弱点。但它并非造成这种弱点的决定性因素。俄国在战前刚被革命的颤动所震撼；1914 年夏，圣彼得堡街头布满街垒。战争的爆发和军事动员确实吞没了刚刚萌发的革命，把它延后了两年半，可最后反倒使它充满了更为巨大的爆炸力。即便李沃夫亲王政府或克伦茨基政府退出战争，那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做到的：社会危机如此深刻、如此严重，以至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可能取胜，即便不在 1917 年也在晚些时候。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不过它如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年后的 1949 年，毛泽东的党在中国夺取了政权。这似乎反过来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它表明，这种关系或许不像当年所表现得那样明确。

我们不必设想，俄国革命进程的一切特点或一切主要阶段和事件的顺序都是预先被决定好了的。但它的总方向并不由数年或数月间的事件所确定，而是经数

---

<sup>1</sup> 二月革命后，成立了立宪民主党贵族李沃夫亲王担任总理的首届临时政府。该届政府在因七月危机而垮台后，由克伦茨基接替主持临时政府。

十年的、真真切切数个时代的发展酝酿而成。那些企图将俄国革命之峰贬低为一些偶然事件的史学家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如同此前试图阻止它兴起的政治领袖们那样无能为力。

每一场革命之后，它的敌人都会质疑它的历史合法性——有时甚至是在两三个世纪之后。请允许我来回忆一下，对于那些仍然怀疑大叛乱之必要性的史学家，特里维廉是如何回应的：“比起这种全国分裂和诉诸武力，当时是否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来使议会权力在英国扎根……？这不是研究或思辨的深度所能解决的问题。人们是其当时所是的样子，不受到后人迟来的智慧的影响，并因此而行动。无论是否有更好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结果，议会都确实是通过剑来赢得作为英国宪制的支配性力量而生存的权利的。”<sup>1</sup>特里维廉在这里追随麦考莱<sup>2</sup>的脚步，赋予大叛乱以明确的正义，尽管同时他强调，它使英国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贫穷，更不高贵”<sup>3</sup>，而不幸的是，这一点或多或少都适用于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其他革命。在强调英国的议会宪制首先归功于大叛乱的同时，特里维廉考察了清教徒的长时段作用。正是克伦威尔和圣徒们，他说道，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并且即便他们自己与这条原则发生了冲突、显得要抹去它时，原则仍然幸存下来并获得了胜利。清教徒革命的“善举”比它的蠢行更为持久。

加以必要修改<sup>4</sup>，同样的说法或许也适用于十月革命。“人们按其当时所做的那样行动，因为他们不能按其他方式行动。”他们不能从议会民主制的西欧模式那里照搬自己的理想。他们是用剑为工农代表会议<sup>5</sup>——并为社会主义——赢得“作为”苏维埃宪制的“支配性力量而生存的权利的”。尽管他们后来把工人代表会议降格为影子般的存在，但那些代表会议、苏维埃以及它们的社会主义雄心仍然是俄国革命最有意义的讯息。

至于法国大革命，从害怕雅各宾瘟疫的伯克，到不相信任何现代民主制的托克维尔，以及被巴黎公社吓坏了的泰纳<sup>6</sup>，再到马德兰<sup>7</sup>、班维尔<sup>8</sup>及其门徒（1940

---

<sup>1</sup> 乔·麦·特里维廉：《英国简史》，第4卷，第2章。——多伊彻注

见《英国简史》，1972年版（G. M. Trevelyan, *A Shortened History of Engl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第299页。

<sup>2</sup>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英国辉格派史学家。

<sup>3</sup> 《英国简史》，1972年版，第299页。

<sup>4</sup> 原文为拉丁文“mutatis mutandis”。

<sup>5</sup> 即工农代表苏维埃。多伊彻在这里用的是意译 council，而非音译 soviet。

<sup>6</sup> 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法国右翼哲学家与史学家。

<sup>7</sup> 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 1871-1956），法国右翼史学家。

<sup>8</sup> 雅克·皮埃尔·班维尔（Jacques Pierre Bainville, 1879-1936），法国保王派史学家。

年后，其中一些人还在贝当元帅<sup>1</sup>鼓励的目光下干着活计)，一长串思想家和史学家曾质疑或否定它的必然性，以便平定革命的幽灵。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作家当中，近期在英语国家风头最健的是托克维尔。很多有学养的人试图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来指导自己对于当代俄国的思考。他们被他这样的说法所吸引：大革命并没有严重背离法国的政治传统，它仅仅顺应了**旧制度**下已经存在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和国民生活的统一。与此类似，出现了这样的看法：苏联，就其取得了任何进步性成就而言，仅仅在于继续了已经为**旧制度**所承担的工业化和改革工作。如果沙皇国幸存下来，或者被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替代，那么这项工作仍然会继续下去；进步会更加有序合理。俄国或许不必付出布尔什维克强索的可怕代价，不必忍受没收、恐怖、低生活水平以及斯大林主义的道德堕落，就能够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强权。

在我看来，托克维尔的门徒们对自己的师傅颇不公平。他尽管轻视革命的创造性和原创性工作，但却没有否认它的必然性或合法性。恰恰相反，通过将之置于法国传统之中，他试图按自己的保守条件“接纳”它，并把它“纳入”民族遗产之中。他的模仿者们对于贬低俄国革命的原创性和创造性工作所表现出的热忱，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甚于“接纳”它。不过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一下托克维尔式的论点。当然，没有哪场革命是**凭空**<sup>2</sup>产生的。一切革命都是在产生了它的社会环境之中并利用它在那种环境里找到的材料来运作的。“我们正在用旧秩序留给我们的砖块，”列宁喜欢说，“建设一种新秩序。”<sup>3</sup>传统的治理方法、紧要的国民热望、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各种累积起来的优缺点——这些正是“砖块”。革命的创新工作（无论它多么大胆）折射着过去。雅各宾派和拿破仑确实继续建设**旧制度**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没有人比马克思在托克维尔《旧制度》一书数年前出版的《雾月十八日》当中更为强调这一点了。而同样确实的是，在最后两任沙皇统治期间，俄国真正开始了工业化，否则她的产业工人阶级不可能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因此在**旧制度**之下，这两个国家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进步能够不受革命的严重“干扰”而“有

---

<sup>1</sup> 二战期间投降纳粹德国、主持维希傀儡政权的法奸头目。

<sup>2</sup> 原文为拉丁文“ex nihilo”。

<sup>3</sup> 列宁没有说过这句话。本书俄译者将这句话回译为《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的文字：“我们要……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6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序”进行。恰恰相反，摧毁着**旧制度**的正是在它之下所取得的进步。它远没有使革命变得多余，反而使之更为必要。进步的力量在旧秩序中受到了如此这般的限制，以至要冲破它。法国争取统一国家的努力已经与封建出身的特殊主义所设置的障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法国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经济需要单一的全国市场、自由的农民、人和商品的自由流通；而**旧制度**只能在最狭隘的限度内满足这些要求。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会说的那样：法国的生产力已经超越了她的封建财产关系，再也不能被限制于保存并维护着这些关系的波旁君主制的外壳中了。

在俄国，问题类似但更为复杂。沙皇时代将国民生活的结构予以现代化的努力受制于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资产阶级的不发达和软弱、专制统治的刻板僵硬、过时的政府体制，以及（最后但不是最无关紧要的）俄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罗曼诺夫家族统治末期的大帝国是半帝国半殖民地。西方股东拥有俄国 90%的矿场、50%的化学工业、超过 40%的工程设备，以及 42%的银行股份。国内资本是稀少的。国民收入远不能满足现代需求，且过半来自极为落后、对资本积累贡献微小的农业。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利用税收来为工业化提供力量之源——例如，建设铁路。不过工业扩张主要还是依靠外国资本。可是外国投资者对于将自己的高额红利投回俄国工业却缺乏持久的兴趣，尤其当他们慑于任性官僚的反复无常和社会骚动时。俄国要取得工业“起飞”（这是罗斯托教授的说法）<sup>1</sup>，只能利用她的农业资源，并超乎寻常地运用自己的工人。在**旧制度**之下，这些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历届沙皇政府太过依赖西方金融资本，以至不能维护与之对立的俄国国民利益；而且他们的背景和社会关系太过封建，以至无法使农业摆脱土地贵族（甚至 1917 年第一届共和国政府的总理都出身于此！）的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之前，没有哪届政府拥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道德威信，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工业化必需的努力和牺牲。谁都没有完成任务所需的眼光、决心和现代思维。（带着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的维特伯爵<sup>2</sup>，是个检验了规律的例外；他作为总理大臣和财政大臣，几乎受到沙皇和官僚集团的抵制。）任何本身不革命的政权原可以将半文盲的农民国家提升到苏维埃经济发展和教育的当前水平，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

<sup>1</sup> 指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16-2003）的经济起飞理论。他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飞速发展时期称为其起飞阶段。

<sup>2</sup>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 1849-1915）是沙俄末期的一位显要官员，曾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和总理大臣。他一方面坚决维护沙皇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对俄国的经济和财政制度进行了一些资本主义式的改革。1905 年革命结束后，维特被沙皇尼古拉二世抛弃、免职。

这里又会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俄国的生产力在旧制度之下已经前进到足以冲破旧社会结构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了。

不过没有哪种经济机制会自动造成既存旧秩序的最终瓦解或者确保革命的胜利。过时的社会制度或许会在数十年间衰落下去，而大部分国民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旧制度**的客观矛盾不得不将自己翻译为主观语词，转化为行动者的理念、渴望和热忱。革命的本质，托洛茨基说道，是“群众直接干预历史事件”<sup>1</sup>。正是由于这种干预——一种在历史中如此确实又如此罕见的现象——1917年才如此非凡、如此重大。对既存秩序的腐朽糜烂的最为集中迫切的意识，在突然之间，抓住了人民的大多数。意识向前跃进，以赶上存在，并改变它。不过这一跃进、这一群众心理的突变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历经数十年的革命鼓动和思想观念的缓慢发展，历经许多党团的兴衰，才造就了1917年的道德—政治气候、领袖、各党以及行动方法。这其中罕有甚或毫无偶然的東西。在最近半个世纪的革命背后，隐约现出整整一个世纪的革命努力。

一面是强权大国的重要地位，一面是社会结构的陈旧脆弱；一面是帝国的宏伟壮观，一面是机构的可怜兮兮。这种鲜明的对比表现出笼罩着沙皇俄国的社会危机。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使这种对比第一次显露出来。她最为勇敢的精神上升为行动。1825年，十二月党人举行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他们是一群贵族知识精英；但大部分贵族反对他们。在俄国没有哪个社会阶级有能力推动国家的进步。城镇稀少且是中世纪式的；城市中等阶级、没有文化的商人和工匠在政治上微不足道。农奴偶尔造反；但在普加乔夫失败之后，还没有出现争取农奴解放的大规模行动。十二月党人是没有任何革命阶级支持的革命者。这是他们的悲剧，并将成为此后直到19世纪末几乎历代俄国激进分子和革命者的悲剧——这种悲剧也将以不同的形式把自身投射于后革命时代。

让我简要回顾一下它的主要几幕和母题<sup>2</sup>。在19世纪中叶以前，出现了新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平民知识分子**<sup>3</sup>。他们来自缓慢成长着的中等阶级；许多人是公务员和教士的子女。他们也是寻求着革命阶级的革命者。资产阶级仍然微

---

<sup>1</sup> 不知多伊彻这句引文本于何处。

<sup>2</sup> 母题 (motif) 在戏剧中指反复出现的情节单元，亦有译为“主题单元”的。

<sup>3</sup> 原文为 Raznotchintsy，为俄文“Разночинцы”的转写。Разночинцы 原意为“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即不属于贵族、教士、农民和市民这四个等级中任何一者的人。在1870年代，这个词开始用以指称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不足道。公务员和教士害怕自己造反的儿子们。农民无动于衷且消极冷淡。只有一部分支持些许改革的贵族，即那些热衷于采用现代农业方法或者参与工业和贸易的地主，希望看到农奴制的废除以及国家行政和教育的自由化。在他们的说服下，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从而为皇朝赢得了此后数十年间农民的坚定拥护。1861年解放法令因此再次孤立了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并在实际上将革命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但土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农奴已被解放，却没有得到土地；而为了能够耕种土地，他们不得不订立沉重的债务和劳役，不得不成为佃农。国家的生活方式仍然落伍过时。这种状况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性促使崭新一代知识分子起而反叛、创造新思想并尝试全新的政治斗争方法。

前赴后继的各个革命团体只从自己身上汲取力量；它们都在自己道路的终点陷入了死胡同。在赫尔岑和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拉甫罗夫<sup>1</sup>的鼓舞下，民粹派<sup>2</sup>在客观上成为农民的战斗先锋队。但是当他们向农民<sup>3</sup>发出呼吁并试图使他们认识到农奴解放的欺骗性和沙皇与地主支配他们的新方式时，这些前农奴们无动于衷，甚至听都不听；他们把民粹派交到宪兵手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有着巨大革命潜能的被压迫社会阶级，因此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精英。民粹派的后继者民意党人<sup>4</sup>不再显然无望地在社会中寻找革命的人民力量。他们决定作为沉默的被压迫人民的托管人而独自行动。他们的政治恐怖主义替代了前辈们的农民民粹主义。此前“到人民当中去”甚或试图在农民当中定居的宣传家或鼓动家被孤独寡言的、英雄主义的密谋家所替代，他们在一位超人的指导下，决心要么胜利要么死亡，给自己担上国民无法完成的任务。其成员在1881年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的集团<sup>5</sup>，由不到四十名男女组成。六年后，仅由十二名年轻人（包括列宁的哥哥在内）组成的团体，便计划取走亚历山大三世的性命。这些密谋小团体使庞大的帝国陷于焦虑不安，并创造了历史。然而，如果说1860和1870年代民粹派的失败表明，期望农民起义是不现实的，那么1880年代民意党人的牺牲又再次揭示出，毫无基本社会阶级支持的先锋队是无力的。这些消极的经验向此后数十年里的革命者教授了无价的教训，就此而言它们并非毫无结果。普列汉诺

---

<sup>1</sup> 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1900），俄国民粹派思想家。

<sup>2</sup> 原文为 Narodniks，相当于俄文“народники”的转写。

<sup>3</sup> 原文为 muzhiks，为俄文“мужик”转写后的复数。

<sup>4</sup> 原文为 Narodnovoltsy，为俄文“народовольцы”的转写。

<sup>5</sup> 应指当时的民意党执委会。

夫、查苏利奇、列宁、马尔托夫和他们的同志们得出的教训是，他们决不能成为一支孤零零的先锋队，而是必须寻找革命阶级的支持——并且必须放眼于农民之外。不过，如今俄国工业化的启程正为他们解决问题。列宁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鼓动家在新生的工厂工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听众。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场持久斗争显而易见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需求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没有哪种社会需求或利益比农民对于土地和自由的渴望更为基本了；没有哪种社会意识比使农民在半个世纪里满足于一部令他们摆脱人身奴役、同时又拒绝给予土地和自由的法令的社会意识——一种使几代农民期望沙皇-神甫<sup>1</sup>能够修正他们的过错的意识更为错误了。革命运动的诸多转型根植于这种需求与意识之间的差异。形势的逻辑产生了这些对立的组织模式：一方面是封闭自足的密谋精英，另一方面则是朝向群众的运动，革命者的专政和民主类型。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知识界在所有这些当中起到的特殊的、独有的和具有历史效应的的作用——我们在其他国家找不到类似者。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冲击沙皇专制制度，在它的墙上撞碎自己的头颅，为后来人预备道路。一种对于自己以及俄国的革命使命的近乎弥赛亚式的信念鼓舞着他们。当最终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前列时，他们继承了一种伟大的传统和一种独特的经验；他们既批判性地评价也有效地利用它们。但是他们也继承了某些的问题和困境。

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从否定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传统开始。他们拒斥“农民社会主义”、对农民的感伤的理想化、激进版的斯拉夫主义、对俄国独特的革命使命的准弥赛亚式的理念。他们与恐怖主义、激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以及封闭自足的密谋精英断绝关系。他们选择以民主方式领导组织、党和工会，以及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现代形式。这种“严格地”甚或纯粹地无产阶级的、不相信农民的态度，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起始阶段的特点；并将成为孟什维克在全盛期的典型特征。不过运动在转入行动后，便不能停留于对本土革命传统的抽象否定——它不得不消化它们当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且加以超越。正是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许久之之前完成了这项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民粹主义者那里继承了对农民的体恤，从民意党人那里继承了集中攻击和密谋决策。没有这些因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便会保持为一株异域植物，或者最好也不过如同普列汉诺夫的杰出著

---

<sup>1</sup> 原文为 Batiushka，即俄文“Бабушка”的转写。

作和列宁在青年时期的一些文章那样，是西欧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发展。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总的来讲，是列宁的成就。他将教条与本土传统相结合。他坚持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需要在农民当中寻求盟友；他赋予知识分子和革命精英以工人群众运动当中有份量的教育和组织作用。这种结合是俄国一个世纪的革命努力的缩影。

如果就此打住，那么对于造成俄国革命的因素，我带给你们的或许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尽管西方习惯于将布尔什维主义当成纯粹俄国的现象，但西欧对它的贡献无论如何夸张都不为过。在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在各个阶段都决定性地受到西方思想和运动的影响。十二月党人之为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余波，不输烧炭党<sup>1</sup>。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拿破仑垮台后，曾是巴黎的俄国占领军的年轻军官；即便与被击败的革命的联​​系也足以点燃他们的思想。1830 和 1848 年的事变、法国社会主义、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英国政治经济学培养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sup>2</sup>、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许多其他人。而后，自身体现着所有这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俄国激进派甚至自由派的巨大的思想征服。难怪沙皇政府的辩护士们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斥为“堕落的”西方的产物。不仅蒙昧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粗陋传道士波别多诺斯采夫<sup>3</sup>，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甚至托尔斯泰也在这种意义上拒斥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他们错得并不离谱：无论西方是否愿意记起，它曾经将自己大量的精神遗产投入俄国革命之中。托洛茨基曾就这一“悖论”写道，西欧“将自己最先进的技术出口给美国……它把自己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出口给俄国……”<sup>4</sup>列宁坦率且有力地说了同样的话：“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 1840 年代至 1890 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的每一种‘最近的说法’。俄国……经受了极端的苦难、痛苦和牺牲，……通过学习和实践的检验，……参照欧洲的经验，……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沙皇国迫使我们过着侨民生活，俄国的革命

---

<sup>1</sup> 原文为 Carbonari。烧炭党是 19 世纪前期意大利的爱国革命秘密组织。

<sup>2</sup> 原文为 Petrashevtsy，为俄文“Петрашевцы”的转写。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 1840 年代由俄国民主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1821-1866）领导和组织的进步知识分子团体。

<sup>3</sup>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1907），俄国保守派法学家、政客，曾任三朝沙皇的顾问。

<sup>4</sup> 不知多伊彻这句引文本于何处。

者……掌握的国际联系之丰富，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切形式和理论的认识之杰出，是其他人所没有的。”<sup>1</sup>

1917 年及其后数年间，在俄国工农的领袖乃至其广大群众看来，这场革命不仅是俄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是一场波及全人类的社会动荡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自命为至少一场欧洲革命的战士，他们正在欧罗巴的东部前哨为之战斗。即便孟什维克也秉持这样的信念，并加以雄辩的表达。而且不仅俄国人这样看待自己。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曾描述过这种远景：“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19 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 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现在……斯拉夫人……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俄国。”<sup>2</sup>“从西方接受了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现在可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源泉。”<sup>3</sup>考茨基将之对比于 1848 年的局势，那时西欧的人民之春被“俄国的严寒”<sup>4</sup>所钳制；如今来自俄国的风暴或许会帮助澄清西方的天空。

考茨基是在 1902 年为列宁参与编辑的《火星报》写下这些内容的；他的文字给列宁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在将近 20 年后，他带着讽刺的愉悦，援引它们来反驳那位如今忿怒于自己预言成真的作者。预言实际上比考茨基或列宁的理解更具预兆性。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时代，革命的中心已经甚至更进一步地向东转移，从俄国转移到了中国。一位对于宏大概括有天分的史学家或许可以推断出考茨基草就的远景，并描画出更为深远的线条，描绘出革命在三个世纪里的一路东进。这条线或许从清教英国开始，经过整个欧洲，扫向中国，并最终触及亚洲的东南边陲。

不过，这样的图像或许是误导性的；它或许太过线性、太过强烈地预定了一段历史进程。可是无论历史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它无疑具有自己的内在连贯性和逻辑。歌德曾说过，知识的历史是一首各民族轮流发声的伟大赋格

---

<sup>1</sup> 列宁原话与此略有差别，编译局译文如下：“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探索、学习和实验，……参照欧洲的经验，……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 3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6 页。）

<sup>2</sup> 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90 页。

<sup>3</sup> 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91 页。

<sup>4</sup> 参见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92 页。原文为：“斯拉夫人曾经是摧残人民之春的花朵的严寒”。

曲。<sup>1</sup>人们或许会说，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它不是一些伟大的革命家们曾期待的世界交响曲。它不是杂乱独声的混成曲、不是庸人们所听到的杂音。它更是各个带着自己的希望和绝望的民族轮流发声的伟大赋格曲。

---

<sup>1</sup> 这是歌德在 1807 年 10 月 21 日与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威廉·里默尔（Friedrich Wilhelm Riemer）的谈话。歌德原话为：“科学的历史是一首各民族轮流发声的伟大赋格曲。”

## II. 革命持续性中的断裂

俄国在 1917 年经历了欧洲史上最后一场资产阶级大革命和第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两场革命合而为一。它们史无前例的结合赋予新政权以非同寻常的生机与活力<sup>1</sup>；但也带来了极度的紧张和压力，以及灾难性的动乱。

在这里，我或许应当冒着赘述显而易见者的风险，简要定义一下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广泛接受的传统看法认为，在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率领着起义人民，然后夺取政权。这一看法在史学家当中造成了许多争议；例如，休·特雷弗-罗珀教授<sup>2</sup>和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sup>3</sup>最近就在争论，克伦威尔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在我看来，无论诉诸何种权威，这种观念都是概略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由此，有人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资产阶级革命差不多是一种神话，它甚至在西方都几乎从未发生过。在清教徒的领袖或铁骑军<sup>4</sup>的指挥官当中，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在带领群众攻占巴士底狱、侵袭杜伊勒里宫<sup>5</sup>的首领人物当中，资本主义企业家、商人和银行家并不显眼出众。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他们在革命期间或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夺取政府的控制权。组成起义大军的是中等阶级下层、城市贫民、庶民和无套裤汉<sup>6</sup>。在英国，领袖们几乎都是“乡绅”；而在法国，则大多为律师、医生、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各处的动荡都终结于军事独裁。可是如果我们以更宽广的标准对待它们，看到它们对社会的总体影响，那么这些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便完全不会表现得仿佛神话一般了。它们最为重要和持久的成果在于，为资产阶级财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关系扫荡了阻碍它们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当清教徒们否认国王的随意征税权时，当克伦威尔捍卫英国船东在英国外贸中的垄断地位时，当雅各宾派废除封建专权和特权时，他们——常常在无意间——创造

---

<sup>1</sup> 原文为法文“élan”。

<sup>2</sup> 休·特雷弗-罗珀 (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英国右翼史学家。

<sup>3</sup> 克里斯托弗·希尔 (Christopher Hill, 1912-2003)，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sup>4</sup> 英国革命初期，由克伦威尔组织的一支志愿骑兵部队。其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故得名“铁骑军”。

<sup>5</sup> 指 1792 年 8 月 10 日巴黎人民的起义。是日夜，巴黎警钟长鸣，起义的首都群众和此前由各省派遣进京的联盟军一道，攻入杜伊勒里宫，迫使路易十六携家眷逃往议会避难。此次起义在实际上宣告了王政的垮台和共和国的诞生。

<sup>6</sup> 原文为法文“sans culottes”。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革命群众的中坚力量，主要由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商人组成。

了必然使生产商、商人和银行家掌控经济并最终获得社会甚至政治至上地位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资产阶级财产能够兴旺发达的条件。正是这一点而非斗争期间特殊的盟党关系构成成为它的种差<sup>1</sup>。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十月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体，尽管它们都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完成的。当前的苏联历史编纂学将二月革命描述为资产阶级的，而把“无产阶级”的标签留给了十月起义。这种区分也为许多西方史学家所采纳，并得到了这一点的支持：在二月，在沙皇退位后，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实际上，两场革命的结合在二月就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推翻沙皇和他的末届政府的，是一次总罢工和一场工人与士兵举行的群众起义。后者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有可能成为新国家机关的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李沃夫亲王、米留可夫和克伦茨基从犹疑不定、乐意向他们让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获得了权力；而只有在苏维埃的容忍之下，他们才能够行使权力。可是他们的政府并没采取什么重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行动。总之，他们没有分割贵族的庄园，没有把土地交给农民。即便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也是不够格的<sup>2</sup>。

所有这些凸显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推动和指导双重剧变时面临的巨大矛盾。他们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有利于资产阶级财产形式成长的条件。他们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旨在废除财产。前者的主要行动是分配贵族的土地。这为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广泛的、潜在的基础。已经摆脱了地租和债务并扩大了自家农场的农民所感兴趣的，是一种能为自己的私产提供保障的社会制度。这不仅仅关乎资本主义农业。正如列宁所言，俄国农村总的来讲是培育资本主义的温床——许多俄国工业企业家和商人出身于农民；并且假以时日和有利的环境，农民或许能够繁育出多得多的、现代得多的企业家阶级。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农民早在布尔什维克起义很久以前就在夺取贵族的土地，因而在1917年，无论哪个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敢认可自发发展着的、暴烈有力的农民革命。慑于城镇中财产所面临的危险，资产阶级政党拒绝破坏农村中的财产。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独自领导起农民叛乱。他们知道，没有农村的变动，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被孤立于城镇而失败。农民害怕一场或

---

<sup>1</sup> 原文为拉丁文“*differentia specifica*”。种差是某一种与同属的其他种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构成成为这一种的特定属性。例如“动物”相对于“人”是属，因此人的种差即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定属性。

<sup>2</sup> 原文为法文“*manquée*”。

许会把地主带回来的反革命，因此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从一开始，革命的社会主义方面就引起了他们的疑虑、畏惧或者敌视。

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城市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支持。但这只是国民中的很小一部分。全国人口总共有六分之一，即二千余万人，生活于城镇：其中仅有半数左右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最多大约三百万受雇于现代工业的男男女女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曾预测，产业工人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能动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俄国工人不只是证实了这一预测。没有哪个俄国社会阶级，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人阶级，表现出俄国工人在 1917 年（及其后内战时期）那样的能量、政治头脑、组织能力和英雄主义。俄国近代工业由少数大工厂组成，并主要集中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就使得群集于两首都的工人对旧制度的神经中枢具有非同寻常的打击力。二十余年密集的马克思主义宣传，1905、1912 和 1914 年斗争的鲜活记忆，一个世纪的革命传统，以及布尔什维克对目的的专注，为工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好了准备。他们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只要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不实现工业和银行业的社会化、不实行工人监督<sup>1</sup>生产、不建立苏维埃政府，他们便不会满意。他们转而背弃起初追随的孟什维克，因为后者告诉他们，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他们的行动，就像农民的行动一样，有它自己的自发力量：他们早在十月起义之前就建立了工厂水平的工人监督生产。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并将工厂造反转变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工业中心，给这项任务所组成的基础却是极其狭隘的。不仅在两首都的工人争取废除财产的同时，全俄广大农村的人们却在争相获得财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处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冲突之中，而且自身还充满着内在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言，俄国既是成熟的也是不成熟的。相较于它的建设性任务，俄国更有能力对付社会主义革命的破坏性任务。<sup>2</sup>在布尔什维克的指导下，工人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并把政权转归苏维埃；但他们并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也无法或长或短地维持自己支配性的政治地位。

---

<sup>1</sup> 原文为“workers' control”，对应俄文为“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这里译为“工人监督”是为了对应于通行译法。本书中除“工人监督”之外的“control”均译为控制。

<sup>2</sup> 这里的“建设性任务”和“破坏性任务”原文分别为“positive task”和“negative task”。据上文大概可知，社会主义革命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秩序这两重任务。后者即为建设性任务，俄国因社会发展落后而无法为之提供必要的客观物质基础；前者则为破坏性任务，富有革命精神的俄国则足以完成之。

首先正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这场革命的双重性是它的力量之源。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早一些发生（或者，如果在 1861 农奴解放时，土地被公平地给予获得解放的农奴），那么农民就会转变为一支保守力量；并且会像整个十九世纪它在西欧（尤其是法国）所作的那样，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到那时，它的保守主义甚至会影响到城镇工人，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源自农村。比起半封建半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秩序的持续力会强大得多。两场革命的合并使列宁所争取的工农联盟得以可能，从而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赢得内战并抵挡住外国干涉。尽管工人的热望与农民的渴求处于潜在的冲突之中，但两个阶级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工人欣欣然于农民对地主的胜利，而看不到自己争取集体主义经济的努力与农民对经济个人主义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只是到内战快结束时，随着农民不再受制于对地主还乡的恐惧而强烈主张经济个人主义，这一矛盾才变得醒目尖锐起来。<sup>1</sup>

此后，城镇和乡村的冲突、两种革命的对立支配了苏联国内场景至少二十年，贯穿整个 1920 和 1930 年代；而其后果则给全部苏维埃历史蒙上了阴影。这部戏剧的情节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列宁在他的最后几年里，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混合经济的方式，和平解决这一两难困境；但是到 1927 和 1928 年，尝试失败了。斯大林于是试图用强力解决矛盾，并开始进行所谓农业的全面集体化。他通过消灭资产阶级革命来使社会主义革命与之分离。

卡尔·马克思和他的门徒们曾希望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免于狂热的动乱、虚假的意识<sup>2</sup>和此起彼伏的非理性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特征。当然，他们所设想的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假定，社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先进工业国。将这些充满信心的期望和这半个世纪里苏维埃历史杂乱成堆的非理性加以对比，实在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种对比也是牵强的。许多非理性都源于俄国两种革命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们造成了一长串无法通过正常的国务方法、政治调解或灵活手腕加以治理的危机。两种革命的结合成了苏维埃的虚弱之源。

---

<sup>1</sup> 即便农民有贫富之别，即便一小部分觉悟农民在革命后不久的 1920 年代初自愿成立了合作社和公社，这种态度也还是普遍的。——多伊彻注

<sup>2</sup> “虚假的意识”是恩格斯在 1893 年 7 月 14 日致梅林的信中对意识形态的评判：“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57 页。）实际上，这种评判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对事物的不正确的反映。

清教徒革命和雅各宾革命中的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起义人民的高度期望与这些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之间的冲突。对起义群众来讲，从来没有哪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在为自由和平等、或者人人皆兄弟和联合体<sup>1</sup>而战斗。当有产阶级急于使自己的革命收益发挥全效和积累财产时，危机便到来了。由于在这方面受到革命的限制，他们便在贫饿交迫的庶民大众强迫进行更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时候，或者退出或者试图中止革命。这就是雅各宾主义衰退时法国发生的情况，那时新贵<sup>2</sup>高声要求废除最高限价<sup>3</sup>和实行自由贸易。然后庶民们发现，他们的革命成果是些冒牌货，自由<sup>4</sup>不过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平等<sup>5</sup>则意味着可以在劳动市场上以名义平等的方式和雇主讨价还价。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英国的掘土派<sup>6</sup>和平等派<sup>7</sup>发现了财产在共和国中的权力。残酷的幻灭开始了。革命党分裂，相互冲突的忠诚撕裂了领袖们。热烈的激情和行动，这种革命在其上升时期的创造力，转变为停滞和衰退时期的一种破坏力。我们也足够早地在俄国发现了不少这种情况，内战一结束，农民就迫使列宁的政府宣布尊重私有财产并重新实行自由贸易，而工人反对派则将此斥为贩卖社会主义，并疾声高呼平等。

俄国革命的困境甚至更加严峻，因为俄国还面临着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说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子宫中孕育成熟的社会主义胚胎。在俄国，或许要说，尚处于孕期非常早的、胚胎远未成熟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就介入了。结果并非死产，但也不是能成活的社会主义躯体。

你们或许会想，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隐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当然和我们的主题相关，并且还顺带关联着西方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描述过，现代工业用雇佣工人替代独立手工业者、工匠和农民，从而如何改变了人们整个的维生过程和生产进程，将之从一大堆孤立的个人追求转变为无数联系着的生产者的集体的和总体的活动。伴随着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我们的生产力越来越相互依赖；

---

<sup>1</sup> 原文为“the Commonwealth”。这个词有共和国的意思，但这里应该指因共同利益结合而成的联合体。

<sup>2</sup> 原文为法文“nouveaux riches”。指法国大革命期间依靠革命和战争发家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译为“新富豪”。

<sup>3</sup> 原文为法文“maximum”。最高限价是法国大革命时，国民公会在无套裤汉强烈要求下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对粮食、面包等生活必需品实施最高限价，并打击囤积居奇的投机行径。

<sup>4</sup> 原文为法文“Liberté”。

<sup>5</sup> 原文为法文“Egalité”。

<sup>6</sup> 掘土派（Diggers）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要求土地公有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代表无地和少地农民利益，后被克伦威尔镇压。

<sup>7</sup> 平等派（Levellers）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激进民主主义派别，得到新模范军下层官兵的支持，后被克伦威尔镇压。

它们已经或者将要实现全国甚至国际规模的、社会性的统一。这正是生产进程的“社会化”——资本主义子宫中的社会主义胚胎。这种生产进程呼唤着社会控制和计划；私有制或者说私人控制则与之相悖。即便通过现代大企业进行的私人控制，也仍然是在分化和扰乱一种本质上统一的、需要确实合理地统一起来的社会机制。

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并非仅仅)是根据这一点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提倡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在生产进程的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主要的历史前提。舍此社会主义便是空中楼阁。试图对本质上非社会性的生产模式施以社会的控制，正如对确乎社会性的生产进程维持私人的或特定集团的控制一样，是不相匹配和时代错乱的。

俄国缺少社会主义的这种基本前提，就像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必然缺少它一样。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农业被分裂为由市场的自发力量掌控的2300或2400万块小农田。在这种原始落后的经济当中，国有化了的工业不过一块小飞地。这意味着，俄国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关键前提：充裕的商品和服务，社会由此才能在高度的文明水平之上、以近乎平等的方式满足其成员的需求。不久前，俄国的工业甚至不能生产任何现代国家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的商品。然而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匮乏和贫穷的基础之上。否则，它的所有期望都是无力的。短缺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只要还没有对所有人都充足的食物、衣服和住房，便会有一小部分人尽其所能地加以攫取，而同时其他人却忍饥挨饿、衣衫破烂并拥挤在贫民窟里。所有这些必然在俄国发生。

另外，真正的起点是一场严重的灾难。经过数年的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干涉，俄国曾拥有的少数工业崩溃了。机器和存货消耗殆尽。全国经济倒退了超过半个世纪。城里人烧掉自己的家具来温暖住所。遭遇饥荒的数百万农民，为了找寻食物而在乡间四处流浪。几百万曾在1917年把守街垒的工人星飞云散，不再是一支团结紧密的社会力量。最勇敢的人死在了内战中；许多人在新政府、新军队和新警察中谋得了职位；无数人逃离了饥肠辘辘的城市；少数留下来的人更愿意花时间做买卖而非干工作，他们成了**沦落者**<sup>1</sup>，被黑市吞噬。正是在这种影响深远的环境里，1920年代初的布尔什维克试图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此期间，

---

<sup>1</sup> 原文为法文“declassés”，指丧失原有阶级地位、向社会更下层沦落的人。

他们无法依靠那个他们自以为是其先锋队的阶级。那个曾被视为新国家的主人、新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和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的阶级，在物理和政治上都已消亡了。因此，虽然乡村发生饥荒，但资产阶级革命却在农村生活的可感现实中幸存了下来，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如同梦幻泡影一般，暂停于虚空之中。

这正是所谓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堕落的真正根源。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民主”、“工人监督生产”<sup>1</sup>近乎空洞的、任谁也觉察不到丝毫内容的口号。正如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曾揭示的那样，苏维埃民主的理念要求存在一个能动的、永远警觉的工人阶级，它不仅坚持反对旧制度，而且也反对任何可能玷污或篡夺权力的新官僚。由于工人阶级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决定充当它的临时代理<sup>2</sup>和托管人，直到生活变得更为正常并产生一个新工人阶级。同时，他们认为，代表一个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自己的职责。这就造成了官僚专制、不受控制的权力和权力导致的腐败。

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的那句名言<sup>3</sup>，几乎不会叫他们吃惊。他们会同意他的。而且，他们还了解阿克顿勋爵及其门徒们忽略的东西，即财产也是权力、也是集中的权力，以及大公司的垄断财产是绝对的权力，它在议会民主制的包裹下运作得最为高效。布尔什维克也很清楚权力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险——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梦想国家的消亡。我至少知道，没有哪本书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得有些学究和教条）那样深入权力腐败的根源。因此在布尔什维克的际遇中存在着一种悲剧因素：所有这些对危险的深刻而敏锐的意识，都没有使他们免于危险；所有这些对腐败的厌恶，都没有防止他们向腐败屈服。

他们作为一个革命党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放弃和解除自己的权力，在实际上将它交给自己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敌人。圣徒或者傻瓜或许会这么做；但布尔什维克却不会。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况，做适当修改便可与十九世纪的十二月党人、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相类，即没有革命阶级支持的革命精英。不过，精英如今是政府，并据守着一座被围的堡垒。这座堡垒它曾不牢靠地拯救过，

---

<sup>1</sup> 原文为“workers' control of industry”，俄译文为“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见列宁：《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sup>2</sup> 原文为拉丁文“locum tenentes”。

<sup>3</sup>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多伊彻注

但仍然需要加以防卫、从废墟中重建并转变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础。被围的堡垒几乎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内战的胜利者难以给予战败者以言论和组织自由，尤其当后者还得到外国列强支持的时候。一般来讲，内战会造成胜利者垄断权力。<sup>1</sup>一党制对布尔什维克来讲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他们自己的幸存以及毫无疑问革命的幸存都仰赖于此。他们并没有预谋建立一党制。他们是满怀疑虑地将之作为权宜之策而建立起来的。一党制违背了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倾向、逻辑和理念。但那时，局势的逻辑取代并践踏了他们的理念和顾虑。权宜之策成了准则。一党制获得了自己的持久地位和动力。通过类似物竞天择的过程，党的层级系统在列宁死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因为有着与暴君品格相匹配的杰出能力，并且完全不择手段，他最适合进行权力的垄断。后面我们会考察他在苏联社会结构转型时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以及这种使社会不断经历剧变的大转型如何使他的权力得以长久地维持下去。不过，即便斯大林也自视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托管人。赫鲁晓夫在 1956 年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不人道时，是这样说他的：“斯大林相信这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所必需的。……他看待这一切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的。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整个悲剧就在于此。”<sup>2</sup>不过，如果说起初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工人阶级四散瓦解并且实际上不在场的时候，觉得有责任充当它的托管人，那么斯大林则是在这种情况发生很久之后，面对重新集结起来并迅速成长着的工人阶级，仍然全力掌控独裁权力，并利用各种恐怖和欺骗手段，来防止工人以及全体人民声索他们的权利和革命遗产。

党的良心与这些权力垄断的现实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早在 1922 年，临终时的列宁就针对斯大林而警告党，要提防反过来欺凌弱小的“暴徒”<sup>3</sup>、杰尔

---

<sup>1</sup> 美国内战则是例外。但这场内战并没有造成国民整体的分裂，或者在全美各地以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北方实际上一致决心防止南方各州的退出；它的优先地位和优势从来没有受到威胁；而且还没有外国武装干涉。——多伊彻注

<sup>2</sup> 这里的译文是按多伊彻的英文翻译的。据俄文翻译的译文为：“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整个悲剧就在于此。”（见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世界当代史参考资料，1945-198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190 页。）这个译文可能存在些许瑕疵。

<sup>3</sup>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 4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50 页。原文为带引号的“big bully”，本书俄译者理解为多伊彻对“杰尔日莫尔达”的意译，恐不妥。原因之一是，按多伊彻在本书中的先例，意译一般会被他放在俄文转写之后，如“*Narodniks or Populists*”。

日莫尔达<sup>1</sup>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并因为没有早点发出这一警告而“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sup>2</sup>。三年后，加米涅夫徒劳地努力使一次激烈的党代会记起列宁的遗嘱。1926年，托洛茨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是针对斯大林，将他斥为“革命的掘墓人”。“他是新成吉思汗，”——这是布哈林在1928年惊恐不安的预感——“他会杀死我们……他会把农民起义淹没在血泊中。”这些并不是几个领导人随意的点评。在这些人背后，曾形成了新的反对派。他们试图使党回归革命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承诺。而这正是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早在1921和1922年就做过的尝试，也是托洛茨基派自1923年以来，季诺维也夫派在1925至1927年间，布哈林派在1928和1929年以及更小、更讷于发声的团体（甚至斯大林主义团体）在其他不同时期曾做过的事情。

我在这里不能展开这些斗争和清洗的故事——我已在其他地方讲过了。显然，随着这些相继发生的分裂被镇压下去，权力的垄断变得越来越狭隘和严峻。起初，一党制至少会给自己的党员留下言论和政治倡议的自由。后来，寡头统治剥夺了他们的这种自由；一党的垄断实际上成为一派（即斯大林派）的垄断。在革命的第二个十年里，极权主义的庞然大物已经俨然成型。最终，一派的统治变成它的首脑的个人统治。斯大林只有跨过大部分初代革命领袖及其追随者的遗体才能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他甚至不得不爬过好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尸首，这些事实度量了他必须打破的抵抗的深度和强度。

政权的种种政治变态同时伴随着1917年理念的败坏。人民所受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不单单是全民所有制和计划、迅速工业化、集体化和人民教育，而且由于某种原因，所谓个人崇拜、粗陋的特权和激烈反对平均主义以及全能警察，也都是新社会的核心要素。对教条最富批判性、最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被掏空了内里，被削减为一套诡辩或半传教士式的准则，以论证斯大林的每一条法令和每一种伪理论性的突发奇想。所有这些对苏联科学、艺术、文学以及这个国家的道德氛围的毁灭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斯大林主义在三十多年里成了

---

<sup>1</sup> 原文为“dzierzymorda”，即俄文“держиморды”（杰尔日莫尔达，《列宁全集》中译第2版译为“杰尔席莫尔达”）的转写。杰尔日莫尔达是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一个爱欺负人的警察。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引申为欺负少数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分子，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0页。

<sup>2</sup>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9页。完整的文字为：“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一个国际组织的官方教条，这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败坏在国际领域以及尤其是在西方工人运动当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反响；对此，我想其他时候再加以考察。

俄国革命作为最后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有着资产阶级革命一些共同的不合理特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它性质中的资产阶级因素。作为清洗大师，斯大林是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的后裔。他的恐怖行径比他们更残忍、更令人厌恶，因为他掌权的时间要长得多，所处的环境更可怕，并且所在的国家长年习惯于统治者的野蛮残暴。我们应当记住，斯大林也是恐怖伊万、彼得大帝、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后裔。<sup>1</sup>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原生的、野蛮的落后性的混合物。无论如何，革命的热望与其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俄国远超其他地方；因此它得用巨大得多的鲜血和虚伪来掩盖这种严重的差别。

那么，革命的持续性又在哪里呢？在所有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变态之后，在如此多的恐怖行径和其他灾变发生之后，它有着怎样的现实性？对于其他革命，也曾提过类似的问题。例如，法国大革命结束于何时何地？是雅各宾派镇压市府<sup>2</sup>和忿激派<sup>3</sup>的时候吗？或者是罗伯斯庇尔走上断头台的时候？还是拿破仑加冕时？或者他退位时？这些事件即便很激烈，也大多笼罩于含混不明之中；只有拿破仑的垮台毫无疑问标志着历史周期的终结。在俄国，类似的含混不明则包裹着诸如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1923年托洛茨基落败、1927年他被放逐、1930年代的清洗、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等等事件。各派将无休止地争论这些持续性中的断裂，并指出在其中的哪次事件里，革命“最终”被叛卖和打败了。（奇怪的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其最后的流亡岁月中，试图说服他的一些过分热忱的支持者，革命并未因他本人被驱逐而走向终结。）这些派别争论自有其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或许从它们当中拾取了一些真相麦穗的史学家们来说。法国最好的史学

---

<sup>1</sup> 恐怖伊万是俄国著名的暴君，以残酷的统治而臭名昭著。彼得大帝统治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大加速了俄国的西化和近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大北方战争的胜利。尼古拉一世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但也对国内外革命运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镇压进步运动，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同时由于害怕遭到暗杀而长期躲避于首都郊外的行宫里。多伊彻这里应该是说，斯大林兼具这些沙皇身上的某种特性。

<sup>2</sup> 这里指巴黎市府（Paris Commune）。巴黎市府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地方政权机关。它建立于攻打巴士底狱之后，由巴黎各区直接选举产生。革命期间，市府一般代表无套裤汉的利益，是推动大革命不断激进化的重要政治力量，并首创了国民自卫军。事实上，巴黎市府被镇压是热月反动时期发生的。这里多伊彻应该是指雅各宾派镇压以市府为基地、代表无套裤汉利益的埃贝尔派。

<sup>3</sup> 原文为“Enragés”。忿激派是法国大革命中代表城乡贫民的激进派，主张全面限价、没收新贵财产和土地国有。该派于1793年7-8月间被雅各宾派镇压，其领袖雅克·鲁被捕后自杀。

家时至今日仍然分裂为亲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丹东派、罗伯斯庇尔派、埃贝尔派、市府派、热月派和反热月派、波拿巴派和反波拿巴派；并且他们的争议经常与法国人当今的政治关切紧密相关。我坚信，未来许多代苏维埃史学家将类似地分裂为（正如我们这些 1920 和 1930 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那样）托洛茨基派、斯大林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民主集中派以及等等；并且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能够无畏无虑地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辩护。

但这样的争论不是解决而是超越了有关革命持续性的问题。用且必须用其他更为广泛的标准来评判它。我们不必走得像克里蒙梭那么远，他曾说过：“革命是不可分离的单一整体。”<sup>1</sup>但克里蒙梭的看法确实有些道理，虽然“整体”是块包含着大量基本金属<sup>2</sup>的合金。

解决我们问题的一种方式是说，革命的同时代人通过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们的政策和作为，承认了革命的持续性。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在人类的意识中，1917 年的大分化显得依旧那么巨大。对我们的国务活动家和意识形态家们以及甚至普通人来讲，它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苏联的统治者和领导人从未停止提及自己的革命出身，这一事实也有其逻辑和后果。他们所有人，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赫鲁晓夫的后继者们，不得不在自己人民的头脑中培育革命的持续感。他们不得不重申即便自己正在打破的 1917 年的誓言，不得不一再重复苏联的社会主义承诺。这些誓言和承诺已经被反复灌输进学校和工厂的各个新世代和不同年龄段当中。革命的传统支配着苏维埃的教育体系。这本身就是持续性的一种有效作用。确实，教育模式被设计得用于掩盖持续性中的断裂，用于歪曲历史，用于为它的矛盾和非理性做辩解。但即便如此，教育体系已然不断地在大多数人民当中重新唤起了对自身革命遗产的意识。

在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现象的背后，是一种以废除私有制和工业以及银行业完全国有化为基础的制度的确确实实的持续性。政府、党的领导层以及政策方面的所有变化都没有影响到这一基本的、不可侵犯的“十月的成果”。这是意识形

---

<sup>1</sup> 1891 年 1 月 29 日，时任议员的克里蒙梭在众议院参加讨论戏剧《热月》的禁演问题时，说出了这句名言。这句话的法文为“La Révolution est un bloc dont on ne peut rien distraire”（大革命是不能分散的整体）。克里蒙梭这句话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当时仍在继续，而不是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历史事件。第三共和国即是第一共和国的延续，当时的共和派即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派的后裔。因为这种历史上的持续性，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不能与法国大革命相切割，也不能与包括雅各宾派在内的革命者相切割，或将之区分为好的革命者与坏的革命者。因此，革命是一个不能分散的整体，要么整个支持它，要么整个反对它。值得注意的是，“bloc”由此衍生出了“政治阵营”的意思。

<sup>2</sup> 原文“base metal”有贱金属的意思，但这里显然是在说组成合金的基本金属。

态持续性的基石。在社会发展进程当中，财产关系或者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一种被动或毫不相干的因素。我们知道，从封建的向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的变革如何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面貌。如今，全面的、充分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意味着甚至更为多方面的和基本的长期转型。认为 25%工业的国有化和 100%的公有制之间只是一种量的差别，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里的差别是在质的方面。在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中，全面公有制势必为人的生产活动和文化追求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由于革命后的俄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全民所有制本身并不能创造出质上崭新的环境，而只会造成它的一些要素。即便如此，也足以决定性地影响苏联的演变过程，并给它的社会转型进程带来某种统一性。

正如我在前面曾说过的，非社会性的生产进程无法与社会控制相匹配，而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奠基于匮乏和短缺之上。苏联这五十年里的全部历史便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匹配并克服匮乏和短缺而进行的成败交织的斗争。这首先意味着，迅速工业化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封建的以及甚至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或许兼容于经济的停滞或增长的迟缓。全民所有制则不然，尤其当它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起来时。这种制度自身就带有迅猛前进的冲动、为丰裕而斗争的必然性以及发展那种需要合理社会控制的社会生产进程的要求。在前进过程当中（战争、军备竞赛和官僚浪费使这一过程在俄国变得比原本更为困难），出现了全新的矛盾，并长期混淆了手段与目的。国民财富正在积累，大部分也是生产者的消费者却面临着持续的、甚至更为严重的短缺和贫困；而对国民生活全方位的官僚控制则用自己替代了社会控制和社会职责。先后顺序似乎颠倒了。社会主义的形式在内容、经济和文化实体存在之前就已锻造成型；而随着内容被生产出来，形式却被败坏或扭曲了。首先，革命创造的社会-政治机构远超国民物质和文化存在的实际水平；后来，随着后者的提高，社会-政治秩序又被官僚制和斯大林主义的重担压得低于它。即便目的也被拉低到手段的水平：无阶级社会的理想图景被降格到过渡时期的悲惨境地以及财富原始积累的粗陋必要性的水平。

社会先后顺序的这种颠倒、目的与手段的这种混淆以及由此造成的国民生活的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危机、动荡以及骚动的最为深刻的根源。替代了社会控制的官僚控制已经成为继续进步的刹车闸；国民期望着管理自

己的财富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它并不大知道如何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求。数十年的极权统治和庞然一体的纪律掠夺了人民自我表达、自主行动和自组织的能力。统治集团虽然摆弄经济改革、放松对国民思想的控制，但还是尽其所能地使人民不善表达和消极被动。这些正是官方去斯大林化的限度之所在。而在官方去斯大林化的背后，潜藏着一种非官方的去斯大林化、一种对彻底变革的广泛期望。官方政策和非官方情绪培育了对远为自由、合理和人道的革命早期英雄主义时代挥之不去或者复而又起的记忆。这一仿佛向过去的复归，伴随着列宁墓前连绵不断的朝圣队伍，或许掩盖着斯大林时代和苏联创造性的思想与历史行动的某种新起点之间尴尬的停顿<sup>1</sup>。无论真相如何，后斯大林时代的不安、反省和摸索都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革命纪元的持续性。

---

<sup>1</sup> 尴尬的停顿（awkward pause）指谈话或问答之间因不知如何回应而陷入的长时间停顿。

### III. 社会结构

现在我们来总地考察一下苏联社会结构经历过的种种变化，从而或许能为这五十年提供一份临时的社会学资产负债表。

在前面讨论革命的持续性问题时，我曾强调了由国家而非“私人企业”或大资本主义集团掌控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情况的意义。这一事实决定了苏联经济增长的动力状况和社会转型的性质。在此没必要详述这一问题的纯经济方面。我们都知道，苏联从最落后的欧洲大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权——其强势地位造成的国际影响在最近几十年里一直伴随着我们。不过必须承认，作为这一崛起的早期阶段及其相伴随的巨大困难的近距离目击者，我仍然无法使自己习惯于接受上述结果。在比如说 1930 年（甚至不是 1940 年），我可能不会相信，苏联会像过去那样迅猛地进步，并到 1967 年，仅钢铁年产量这一指标就达 1 亿吨。这超过了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产量的总和，只比美国钢厂的产出少 2 千万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工程型工业以及大概与美国规模相当的生产物资产量。当然，消费工业是大大为落后的。不过我在这里会更加考虑经济发展的社会学效应和结果，而不涉及进一步的经济统计数据。

在继续考察之前，我们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五十年并非一段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时期。其中七八年充斥着武装冲突，后者造成了其他参战国所不能比拟的严重倒退和广泛破坏。另有十二三年被用于弥补这些损失。实际增长期包括 1928-1941 年和 1950 年迄今，总计大概三十年。而在这些年份里，苏联的很大一部分资源（平均约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被消耗于二战前后的军备竞赛中。如果能以真正的和平年份这一理想单位来衡量苏联的进展，那么人们会得出结论，苏联的进步是在二十或至多二十五年里取得的。这一点是人们在评价上述表现时必须记住的。不过，如今的苏联社会当然是这半个世纪的动荡的产物，因而在它的发展中，得与失、建设与破坏是不可分割的；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无有成效的工作和浪费的杂糅交织则已经影响到了苏联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氛围。

苏联在转型后首要的和最显著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城镇化。自革命以来，城镇人口增长了 1 亿多。在这里又有必要对时间尺度加以纠正。城市人口的流失和缓

慢恢复是 1917 年后第一个十年的标志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至少欧俄地区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密集的城镇化发生于 1930-1940 年和 1950-1965 年。大概 800 座大中型城镇和超过 2000 个小型城镇定居点被建立起来。在 1926 年，城镇居民仅有 2600 万。到 1966 年，这一数字为 1.25 亿左右。仅在最近十五年里，城镇人口就增加了 5300-5400 万，这相当于不列颠群岛的人口总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 15% 提高到约 55%；这一比例迅速攀升至 60%。在这一方面此前的记录中，美国增加 1 亿城镇人口花了 160 多年；如果进行相关性更强的百分数比较，那么在 1850-1950 年，美国花了整整一个世纪来把城镇居民占比从 15% 提高到 60%。在这一百年当中，大规模移民、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以及免于外部侵略和战争破坏，更不用说气候因素，刺激和推动了美国城市和城镇的迅速成长。苏联的城镇化，无论就其速度还是规模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变迁（即便发生在更优越的环境当中）本来会在住房、定居、健康和教育等方面造成巨大的难题；而苏联所处的环境仿佛专门被设计成用于急剧加强和放大混乱和冲击。

只有一小部分扩张可以归因于自然增长或者城镇人口的迁徙。大部分新增城镇居民都是年复一年从乡村迁移而来、被引向工业劳动的农民。就像西方老牌先进国家一样，苏联在农民那里找到了主要的工业后备劳动力。西方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初期，时常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没收措施（在英国是“圈地”）和严厉的劳动法规。后来，西方主要依靠劳动力市场遵循供需规律的自发运行，来为工业提供所需人力。这暗示着，在数十年或数个世纪的进程当中，农村人口过剩和（有时是）饥荒将大量冗余人手抛向劳动力市场。在苏联，国家通过计划和指导来确保劳工的供应。国家的经济支配地位是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造成如此巨大的转变。

农村人口迁移在真正意义上始于 1930 年代初，并且与农业集体化密切相关。后者使政府机构能够控制农场中的剩余人力，并将之转移到工业当中。这一进程起初是极为困难的，并使用了大量强力和暴力。在其他国家，经济必然性和法律法规的反复教育已经使一代代工人养成了受控于工厂汽笛的、固定的工业生活习惯。但这种习惯在俄国还付之阙如。农民已然习惯于根据俄国严酷的自然节气安排田间劳动：夏天从日出劳作到日落，冬天的大部分时间则坐在火炉上打盹。他

们如今被迫适应一种全新的工作程序。他们抗拒、磨洋工、破坏工具，还在各工厂和矿场之间不断迁移。政府通过严厉的劳动法规、威胁流放以及确实流放到强制劳动营，强行落实纪律。很大程度上缘于刻意的反消费主义措施——政府一心要获得生产物资和军需品的最大产出——住房短缺和消费品的严重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困难和混乱。即便不久以前，几家人共用单间和厨房在城里还是司空见惯的；而在工业定居点，工人群众则常年累月地群居于棚屋当中。犯罪猖獗。但与此同时，数百万接受过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的男女参加了工业技能培训，并专心于新生活方式。

随着时间的流逝，剧变造成的社会摩擦和冲突越来越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工业和军队的伟业似乎反过来证明了甚至那些暴力、痛苦和血泪的正当性。但或许正如我在这几十年里一贯认为的那样，没有那些暴力和血泪，伟大的建设工作会更为高效得多，并且其社会、政治和道德后果也会更为健康。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仍在继续，并且没有那样强力的推动。城镇人口年复一年地按照过去的规模增长；尽管受到计划和控制，但这一进程遵循着自身的节奏。在 1930 年代，政府不得不将大批愤懑不已的农民拖入城镇；而最近十年左右所遇见的，却是人们自发地从农村涌向城镇。它不得不费尽心力，把农村生活变得更吸引人一些，以保住农场中的年轻劳工。但当前的人口趋势或将持续下去；在下一个十或十五年当中，很可能会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城镇里。

在 1917 年仅占少数的产业工人如今构成为最庞大的社会阶级。国家在工厂和办公室里任用了大概 7800 万人——它在二战结束时任用了 2700 万人。<sup>1</sup>超过 5000 万人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建筑业、交通部门、通讯部门和国营农场工作。其余人则在各种服务性部门中谋生——其中 1300 万人从事医疗、教育和科研工作。把体力工人和技术人员跟办公室职员准确区分开来是不容易的，因为苏联的统计数据将它们并为一类——它的社会学意义将在后面讨论。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其数量或许在 5000-5500 万之间。

工人阶级是高度分层的。斯大林的劳工政策致力于划分不同的薪资级别，并

---

<sup>1</sup> 这句话如直译，则为“它在二战结束后曾任用 2700 万人”。这颇有歧义，易让人理解为，二战结束以来任用如此多人，即从 1945 年至 1960 年代中期的增加人数。而据《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国民经济》（*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 Моск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1990）第 175 页，1945 年苏联工人和职员年均总人数为 2730 万。因此，这里的 2700 万是二战结束时的数字，而非此后的增加人数。二战正式结束于 1945 年 8 月，故 1945 年的年均值亦可以“二战结束后”形容。

使工人贵族高于大部分报酬过低的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有必要给技能和效率提供激励；但工资差别实在太甚。它们的实际程度曾经并且仍然被包裹在异乎寻常的隐秘之中。自 1930 年代以来，政府再未公布过国民工资结构的相关数据，研究者只能以支离破碎的信息为满足。整个斯大林时代都在对平等派（或称“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者”）进行凶猛的猎巫；但它并不如其所表现得那样有效，自然也比不上政治猎巫。

对薪资结构数据的隐瞒表明，在斯大林时代及其后，统治集团在追求自己的反平均主义政策时怀着怎样的负罪感。并没有类似的负罪感阻止我们的产业巨头宣扬自己的利润，或者妨碍我们的政府揭示有关我们的薪资级别的事实。当然，苏联并不存在类似我们的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之间“正常的”不平等。不平等是存在于劳动所得当中的。但对于任何一届苏维埃政府来说，将它完全公之于众显然都太过危险。工人在劳动所得方面的差别似乎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类似；苏联更全面的社会服务则使之大为缩小。在最近几年里，工资结构一再遭受大规模的调整。在去斯大林化初期，不平等得到了明显但规模难以估量的减轻。此后，新的工资政策日益遭到管理者和工人贵族的抵制。但在一种持续且迅速扩张的经济当中，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使分层无法过分严格。广大工人群众持续不断地接受熟练工种的培训，并从低收入群体转入高收入群体。

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文化分层有时甚至比经济分层更重要。这一主题无法进行明晰确切的社会学描述或分析；我在这里能做的，是尽量就此阐述一个总体看法，并指出它的复杂性。工人阶级的巨量增长已经造成了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和不协调，这反映出前后相继的工业化各阶段以及它们相互间的部分重叠。每一阶段都形成了工人阶级的不同层级，并造成了意义重大的分裂。大部分工人阶级都打着深刻的农民起源的印记。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家庭在革命前就定居于城镇，并拥有某种工业传统和革命前阶级斗争的记忆。实际上，最老的工人层级是在 1920 年代重建时期形成的。它相对轻松地适应了工业生活节奏——这些工人是自愿来到工厂的，并且无需服从严格的组织管理。他们的子女是工业人口当中最稳定和最城镇化的成分。从他们当中产生了被提拔的人<sup>1</sup>——1930 和 1940 年代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贵族。其余那些继续身处普通群众之列的人，则成为最后

---

<sup>1</sup> 原文为“vydvizhentsy”，为俄文“выдвиженцы”的转写，或译为“被提拔的干部”。

一批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自由参与工会活动（甚至参与罢工）并享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言论自由的苏维埃工人。

这一层级和下一层级之间的对比极为鲜明。2000 多万农民在 1930 年代迁移到城镇。他们的适应过程是痛苦而坎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是背井离乡的村民和情非所愿的城镇居民，依然散漫无序、绝望无助。他们被加以驯化，以遵守工厂工作的习惯，并受控于无情的程序和纪律。正是他们使苏联城镇带上了常常令外国访客吃惊的灰色、悲惨和半野蛮的外表。他们把农民天然的个人主义带进工业当中。官方政策对此加以利用，鼓励工业新兵们为了奖金、津贴和多种多样的计件酬金而相互竞争。因此在工厂的工作台上，工人转而反对工人；“社会主义竞赛”的借口被用于防止形成和显露任何形式的阶级团结。1930 年代的恐怖统治给这类人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印记。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今已年逾五旬）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成为苏联工人当中或许最落后的分子——缺乏教育、贪多务得、奴性十足。只有在它的第二代那里，工人阶级的这一层级才能够淡忘城镇化最初的冲击。

在二战余波中进入工厂的农民仍然经历了艰苦的生活条件、严重的住房短缺、严厉的劳动纪律和恐怖统治。但他们大部分是渴望逃脱满目疮痍、饥肠辘辘的乡村而自愿来到城镇的。数年的军队生活使他们做好了服从工业纪律的准备，并在自己的新地方发现了比 1930 年代的城镇和工厂定居点更能够吸收和同化新人的环境。适应过程也没有那么痛苦。此后一批受训者则是在废除了旧劳动法规的后斯大林时代进入工厂的，并能够相对免于短缺和恐惧而专心于自己的职业，因此适应过程还要更容易一些。最年轻的年龄段、最近的移民和此前几批人在城镇养育的子女，则带着前辈所缺乏的自信而进入工厂，并在改革过时的劳动程序和改变苏联工厂的生活氛围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几乎全都接受过（“完全或不完全的”）中等教育，其中许多人还参加了校外学术课程。他们常常与能力更低、更不文明的工头和管理者发生冲突。这或许是苏联工人阶级当中最进步的群体，组成了核反应堆、计算机和航天飞船的建造者。他们和自己的美国同行一样地富有生产效率，尽管苏联每一工时的生产率仍然只有美国的 40% 甚或更少。低下的平均值当然源于苏联工业人力巨大的多样性，但也由于我刚刚试图考察的文化和效率水平的诸多差异和不平衡。即便如此，苏联的平均生产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

领先于西欧；并且值得旧事重提的是，在 1920 年代，美国的生产率是如今的三分之一左右，而那时苏联每一工时的产量仅为当时美国的十分之一。

所有这些太过粗略的描述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对于苏联工人阶级不同寻常的社会和文化异质性的总体看法。迁移和扩张的进程太过迅速、太过猛烈，以至无法使各层级相互同化、形成共识，并促进阶级团结。我们已经看到，在革命之后的许多年里，工人阶级的萎缩和瓦解如何使官僚将自己确立为支配性的社会力量。此后发生的事情则使它得以巩固这一地位。工厂新劳力的招募方式和迅猛的增长节奏使工人阶级陷于长期的紊乱和碎片化状态，无法获得凝聚、平衡、团结，并找到一种社会-政治认同。数量的急剧膨胀使工人失能无力。官僚尽其所能地使工人保持这种状态。它不仅令他们在工厂的工作台上互相反对，还在他们之间煽起各种厌恶和对立。它否认工人有权提出要求并通过工会保护自己。但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被自己的离心力撕碎，那么这些手段和恐怖统治本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雪上加霜的是，不断地将头脑聪明、精力旺盛的工人提拔到管理岗位使普通工人失去了潜在的喉舌和领袖。辛苦劳动的人缺乏教育，因此这种人才流失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有利于部分工人的社会流动性使其余工人陷于社会和政治的虚弱状态。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的前景或许更有希望。团结联合、融为一体的客观进程正在工人阶级当中发生，并且还伴随着社会意识的成长。这一点（再加上技术进步的要求）已经迫使统治集团扫除旧的工厂纪律，并向工人让出较于斯大林时代更多的活动空间。这离言论自由和工人真正参与监督产业，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随着工人阶级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同质和自信，它的热望便可能集中于这些要求之上。倘若如此，工人或许会作为一种独立因素而重新进入政治舞台，准备挑战官僚、重新开展他们曾在 1917 年取得过巨大胜利但却长期未能继续下去的解放斗争。

工人阶级扩张的另一面，是农民的萎缩。四十年前，乡村小农占全体国民的四分之三有余；如今，集体化了的农民仅占四分之一。农民如何绝望地抵抗这一趋势，对他们使用了怎样猛烈的暴力，如何迫使他们为工业化贡献力量，他们在集体分派之下如何满心厌恶、迟缓懒散地耕种土地——所有这些都已众所周知了。

但是，正如巴特菲尔德教授<sup>1</sup>在某种不同的语境下所言：“同时代人往往太过专门以其暴行来评判革命，而后来者则常常似乎由于无法考虑到或生动地了解这些暴行而犯下错误。”<sup>2</sup>作为1930年代初集体化的目击者和其强迫方法的严厉批评者，我想在此回忆一下俄国农民的悲剧性命运。在旧制度之下，饥荒定期席卷俄国农村——中国农村过去曾是如此，印度农村如今还是这样。正如许多不发达国家仍然所是的那样，在饥荒的间歇期内，不被计数（从统计数据上看不出来）的几百万农民及其子女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sup>3</sup>旧制度对农民的残酷绝不逊于斯大林政府，只是它的残酷性仿佛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即便道德家感伤的良心对此也愿意接受。这并不能饶恕或者减轻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罪行，却会将问题置于正确的角度之中。那些主张只要让农民自行其是便会万事大吉的人，那些将旧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的个人主义加以理想化的人，是在奉献由自己的想象力虚构而成的田园牧歌。陈旧原始的小农田无论如何都过于陈腐，以至无法幸存到工业化时代。无论俄国还是美国都是这样；而即便在它的经典故土——法国，我们近年来都已目睹了农民的急剧萎缩。在俄国，小农田是国家进步难以克服的障碍：它无法为日益增长的城镇人口提供食物；它甚至不能养活人口过剩的乡村中的儿童。强制集体化唯一合理的替代者是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集体化或合作化。对苏联来讲，这种替代方案曾有多大的现实性，这在今天是没有谁能确定得了的。所能确定的是，强制集体化给苏联留下了尚未忘却的遗产：低效率的农业和城乡对立。

农民遭遇的另一重打击加剧了这些灾殃，并且这一打击超越了集体化的所有暴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苏联损失的2000万人大多是农民。农村人力的缺口如此巨大，以至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大部分村庄只能见到妇孺、残疾和老人在田间劳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业的停滞状态以及其他很多东西：家庭关系、性生活和农村教育面临的巨大矛盾，以及乡村当中异乎寻常的冷漠死寂。

---

<sup>1</sup>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英国史学家。

<sup>2</sup> 赫·巴特菲尔德：《基督教与历史》（伦敦，1949年），第143页。——多伊彻注

<sup>3</sup> 例如，《泰晤士报》驻德里记者1967年2月3日题为《比哈尔村民正慢慢饿死》的文章就写到了这种情况：“来自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县的报告指出，最贫穷的村庄已经陷入缓慢饿死的境地。”实际上，“在北方邦东部和比哈尔邦的灾区，大概2000万无地劳力”面临着饥荒的威胁，除非政府一直到秋季都给他们提供食物。与此同时，旱灾的威胁加剧了恐怖：“……一旦村里的水井干涸，人们便会启程找水。大批找水的流民肯定会使给他们分发食物的任务变得大为复杂。”同时，《世界报》报道称，50%的塞尔加尔儿童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而在五岁前夭折。这些事实不过被作为某一天的小新闻而被报道的。——多伊彻注

作为所有这些事件的结果，在苏联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农民的地位急剧下滑。农业的状况仍然得到了严重的关切，因为它影响到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情绪。歉收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件紧要的事情；连续几次的糟糕收成影响了 1964 年赫鲁晓夫的垮台。农民也没有真正融入社会的新工业结构当中。在**集体农庄**<sup>1</sup>的外表之下，仍然经营着许多旧式个体农业（最小最陈旧的那种）。在计算机运作的自动化康采恩的一步之外，还有着农村商人拥挤其间的破旧的、东方式的集市。但布尔什维克害怕农民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确实，**集体农庄**还有贫富之别；到处都有狡黠的农民设法绕过各种规章制度，出租土地，暗中雇佣劳力，并赚了不少钱。但是，这些原始资本主义的幸存不过一种边缘现象。如果当前的人口趋势——从农村向城镇迁移——持续下去的话，农民将继续萎缩；或许会出现集体所有的农庄向国有农场的大规模转变。最后，或许可以想见农业变得“美国化”，并且仅占用很少一部分国家人力。

与此同时，尽管农民逐渐减少，但**农民**的传统仍然大量隐现于俄国的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学和艺术当中。尽管大部分俄国人已经生活在城镇当中，但大部分俄国小说，大概五分之四，仍然以乡村生活为主题、以**农民**为主角。即便退场时，他也给新俄国投下了长长的、忧郁的影子。

现在我们来看看所有对苏联的社会学描述中最复杂难明的问题，即官僚、管理集团、专家和知识界的问题。他们的数量和特殊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国民经济中任用了 1100-1200 万专家和行政人员，而这一数字在 1920 年代仅为 50 万，在革命前则不到 20 万。此外，我们还必须加上 200-300 万政治层级系统和军事机构的常任成员。这些人数庞大的集团约占国家任用人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几乎与集体化了的农民（**集体农庄**仅有 1700 万庄员）数量相当。他们的社会地位当然高得多。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些集团混为一谈，统统打上官僚或管理阶级的标签。应该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和行政人员与仅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明确区分开来。真正的管理人员来自前一类，尽管它们之间不能划等号。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大概占比 40%，即超过 450 万人，如果加上党务干部和军事人员，则或许有 550 多万。

---

<sup>1</sup> 原文为“kolkhoz”，为俄文“колхоз”的转写。

那么这就是曾被托洛茨基指为工人的新敌人的特权官僚吗？或者吉拉斯的新阶级？（你们或许记得，托洛茨基并不认为官僚是一个新阶级。）必须承认，我不愿太过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在此我不能深入问题的语义学方面并探讨阶级的定义。让我就这么说吧：我在经济或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对立之间进行了区分。例如，高薪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劳工之间的差异是一种不能等同于阶级对立的平等；它是同一社会阶级内部的差异。在我看来，吉拉斯所谓“新剥削阶级”的看法以及类似的有关苏联“管理型社会”<sup>1</sup>的观念，是简单化了。它们没有澄清反而模糊了问题。特权集团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是复杂的，不是一两个标签就能显示明白的。他们是混杂的；他们既是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和其他社会的剥削阶级有着一定的共同特征；他们缺少后者的一些本质属性。他们享受着自已顽固而野蛮地捍卫着的物质和其他方面的好处。在这里我们应当再次留心笼统的一概而论。大约三分之一的专家是收入低下的教师——对于他们的生活状况，苏联新闻界最近发了许多抱怨。50万医生大部分也是如此。200万工程师、农艺师和统计员当中，许多人的工资低于高级熟练工人。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我们的中产阶级下层。这固然远高于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生活标准。但如果谴责这种小康状态以剥削劳动为基础，那么这样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会是极为贫乏的。对于官僚、党务层级系统、管理集团和军事人员来讲，只有其上层的生活状况才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富人和新贵。这些集团的规模是无法确定的——我再再说一遍，有关他们数量和收入的统计数据被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了。这些集团和所有剥削阶级（我这里是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收入都至少部分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此外，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支配着苏联社会。

但是这个所谓的新阶级缺少财产。他们既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土地。他们的物质特权被限制于消费领域。不像我们社会中的管理人员，他们无法将自己任何一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他们无法通过耐久且昂贵的工业存货和大量金融资产来积蓄、投资和累积财富。他们不能将财富遗赠后人；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使自己作为一个阶级而持久地存在下去。<sup>2</sup>托洛茨基曾预言，苏联官僚会争取获得把

---

<sup>1</sup> 管理型社会（managerial society）是美国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 1905-1987）提出的概念，指由管理者作为统治阶级、对社会各方面加以控制的社会。

<sup>2</sup> 不过，他们能以很低的利率在储蓄银行存款。1963年，将近1400万人有储蓄账户；人均储蓄额为260卢布。这一均值掩盖了不同个人存款金额的差异。不过由于很少有人愿意在银行存不到260卢布的数额，这

自己的所有物遗赠给子女的权利，或许还会试图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成为托拉斯和康采恩的股东。三十多年前的这条预言迄今尚未实现。毛主义者声称，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他们指的或许是当前国家对产业管控的去集中化。这些断言的证据目前还太过稀少。理论上讲，如今对斯大林主义过度集中化的经济管控的反动或许会在工业管理者当中刺激起新的资本主义倾向。我想，也许能在南斯拉夫觉察到这类情况的种种迹象——最多不过如此。可是，仅仅由于放弃中央经济计划会严重打击俄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地位，这种倾向是不大可能在苏联占上风的。

撇开推测之论，就苏联官僚尚未给自己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事实来说，它的社会支配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稳定且会消亡的。财产惯常是任何阶级的至上地位的基础。任何阶级的凝聚和团结都有赖于此。对于有产阶级来说，财产是一种决定性因素。它也是一种积极因素，能够促使阶级为捍卫它而集结起来。任何有产阶级的战斗口号都是“财产的神圣”，而非单纯剥削他人的权利。没有任何类似的纽带把苏联社会的特权集团凝聚起来。他们和我们的业务经理一样掌管着产业，而且是绝对的掌管。但在我们的业务经理背后还有股东（尤其是大股东）。苏维埃经理们不仅必须承认所有股份归于全民，而且还得声称自己代表全民（尤其工人阶级）行事。他们能否继续这样装下去，仅仅取决于政治环境。工人或许会或许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如此。他们或许会如同许多迟钝的股东那样，接受坏经理；又或许会把他们打发走。换句话说，官僚支配地位的基础并不比一种政治均衡<sup>1</sup>状态更稳定。长远来讲，相较于任何一种由法律、宗教和传统加以神圣化的、既存的财产关系结构，这种社会支配地位的基础都远为脆弱。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层级系统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对立；还有一些年轻的理论家把二者视为完全羽翼丰满了的、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并如同我们过去常常谈论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那样谈论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据说，工人或许会与之结盟的技术人员致力于推翻革命以来篡权夺位的“集中制政治层级系统”<sup>2</sup>。不过如果这数十年里统治着苏联的“新阶级”单独构成了“集中制

---

一差异似乎并不具有社会重要性。在苏联，高收入者喜欢把钱花在例如小汽车和别墅这类耐用消费品上，而不是存在政府控制的银行里。——多伊彻注

这里的“别墅”原文为“dachas”，系俄文“дача”转写的复数，指乡间度假小屋。这种小屋在苏联并不罕见。——译者注

<sup>1</sup> 原文为“political equilibrium”，指各政治集团根据一定规则就权力和利益分配达成协议的状态。

<sup>2</sup> 原文为“central political hierarchy”。根据上下文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指苏联官僚集团。因此，“central”并

政治层级系统”，那么它的身份确实非常捉摸不定。在斯大林生前身后不断发生的清洗中，它的成分一再发生广泛的变动。这个“新阶级”确实很像一只社会学家的柴郡猫<sup>1</sup>。

实际上，苏联官僚行使着比任何现代有产阶级都要大的权力；但它的地位却比任何类似阶级的一般地位都要脆弱。它的权力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同时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但悖谬的是，这类权力的每一种都起源于一次解放举措。官僚的经济专权源自废除工业和金融领域私有财产；政治专权来自工农对旧制度的全面胜利；文化专权则缘于国家全面负责人民的教育和文化发展的设想。由于工人无法维持他们在1917年的至上地位，所有这些解放举措都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官僚成为一种无主经济的主人；它建立起对全民的政治和文化监护。但是权力的起源与权力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意图达到的解放效用和已经达到的效用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地产生严重的政治对立和一再发生的清洗。这些紧张和清洗一次次地表现出官僚缺乏社会凝聚力。特权集团并没有团结成一个新阶级。他们并未从民众的头脑中根除他们由以获得权力的解放举措；也无法说服群众（甚至他们自己），他们使用权力的方式与这些解放举措相般配。换句话说，“新阶级”尚未给自己取得社会合法性的认可。它必须不断隐藏自己的身份，而资产阶级和地主则从来不必如此。它感觉自己仿佛是历史的私生子。

我已经说过，负罪良心迫使统治集团将“工人”和“职员”<sup>2</sup>归并为一类统计总数，还把国民收入的工资结构和分配作为国家机密。“新阶级”因此消失在“工人和职员”的庞大灰色群体中。它遮住自己的脸，将自己在国民蛋糕中的份额隐藏起来。经过如此多次反对平等派的猎巫，它仍然不敢公然冒犯群众的平均主义。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明白指出的：“对于我们的中产阶级来说，规矩是不落后，而在苏联，特权者必须经常记得落于人后。”这使我们相当深切地认识到苏联的社会风气和根本道德观念，并再次较为充分地了解了革命传统的生机与强制力。

此外，苏联人是一道<sup>3</sup>出现的。他们一道接受教育。在社会分层仅仅基于收

---

不指地方之上的中央（否则各级地方官僚就被排除于外了），而应指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集中制。“hierarchy”亦不能理解为统治集团，因为一般的、基层的技术官僚权力不大，并不具有统治集团的地位，虽然他们作为统治集团的下属，同样与被统治者处于相互对立之中。

<sup>1</sup> 柴郡猫（Cheshire cat）是英国童话《爱丽丝奇境漫游》中一只随时出现、随时消失、行踪不定的猫。

<sup>2</sup> 在这里，原文为“workers”和“employees”，对应的俄文当为“рабочие”和“служащие”。

<sup>3</sup> 原文为法文“en masse”。

入和职能而非财富的地方，群众教育的进步对于争取平等来说，是一股强大且终究势不可挡的力量。我们看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接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苏维埃专家的人数从 50 万增长到 1200 万，并且还在继续增长。在一个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的社会中，特权集团必须不断消化新的庶民和无产者成分，他们发现同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再次阻碍了“新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巩固自己。<sup>1</sup>

如前述，长期的人才流失使苏维埃工人阶级沦为驯顺而惰性的群众。如今，相反的进程正在发生：群众教育的发展快于特权集团的扩张，甚至快于工业化的需要。它确实超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最近的教育调查表明，80%的苏联中学生（大部分是工人子弟）要求进入大学。大学没法接受他们。高等教育的扩张无法跟上中等教育的发展脚步；而工业需要人手。于是这么一大批青年从大学门外转道工厂。尽管造成了种种困难，这种情形也还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地表现出，苏联的脑体差别实际上正在如何地缩小。这直接造成了正被挤入工人阶级队伍的知识界的相对生产过剩。工人-知识分子是政治体<sup>2</sup>之中富有创造性但也暗含爆炸性的因素。革命传统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迫使官僚给予工人这样多的教育，以至其远远超出狭隘的经济所需，也许足以威胁特权集团安危。或许可以认为，官僚由此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样的看法或许使前景过于戏剧化。但我觉得，新生的矛盾和紧张显然使苏联社会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动力，不会允许它在一个“新阶级”的支配下陷于停滞和僵化。

---

<sup>1</sup> 1966 年，各年级受教育的学生有 6800 万人，与之相较，革命前为 1000 或 1100 万人。由于人口学的原因（战时的低生育率），在 1940 和 1950 年代这二十年里，学生数量停留于 4600-4800 万人。但在最近七年里，增加了 2200 万人。4700 万是中小学生，360 万是大学生，330 万在技术学院，1300 万接受成人教育，其中有大概 200 万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不脱产的大学课程。1950 年以来，大学生数量翻了三倍。——多伊彻注

<sup>2</sup> 原文为“body politic”，在这里当指作为由国民总和而成的政治实体的苏联国家。所谓“body politic”是西方政治理论中对国家机器、教会、民族国家等政治实体一种比喻。在其中，政治实体被类比于身体，组成政治实体的不同群体则被类比于身体的不同部分。正如各部分相互配合才能使身体正常运转意义一样，只有不同组成部分各司其位、相互配合，政治实体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运作。这种比喻固然指出了政治实体是为其所有成员的总和，但更根本地在于强调这些成员在政治实体当中不同的职能和地位。如果这种差异被视作固定不变的，那么就会将政治实体内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视为具有自然合理性的东西。因此，政治体的比喻常常被用于论证例如君主制、贵族制这类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存在合理性。

## IV. 阶级斗争中的僵局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只概览了苏联的国内场景，而没有涉及国际事件和国际压力。不过，苏联的内部演变自然不能孤立于它的世界环境、国际力量平衡和列强外交，也无法隔绝于西方工人运动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状况。所有这些因素都曾几乎持续不断地影响苏联的内部发展进程，并反过来受到后者的作用。

“十月革命，”列宁过去常说，“在俄国打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sup>1</sup>这幅意味深远的图景集中体现出早期布尔什维主义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在这里，十月革命不被视为单纯俄国的现象：在“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所发生的显然不会是能够独力自存的行动。即便有着俄国的突破，帝国主义——大工业-金融集团的扩张型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工人阶级仍然必须打破链条的其他环节。他们会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以及多快这样做？——这些都是问题。西方的一个或数个牢固环节会断裂吗？或者是东方的（中国或印度的）另一个薄弱环节吗？无论答案如何，都基于这样的设想：这场革命具有普世性；而社会主义注定是国际的，它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国际的。

这种理念深深根植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中；它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假设，还是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当然，即便在 1789 年，像孔多塞<sup>2</sup>、克洛茨<sup>3</sup>和雅各宾派世界主义者那样的人都曾梦想过各民族的普世共和国。但他们的梦想并不符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可能性和任务。他们的革命只能使法国从封建和后封建割据时代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它无法超越民族国家。任何一种超国家的社会组织的物质条件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到十九世纪，这些条件才开始被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出来。通过它的机械技术和国际劳动分工，工业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并由此造成了一种世界交往的经济可能性。早在 1847 年，

---

<sup>1</sup> 列宁没有说过这句话。本书俄译者将这句话回译为列宁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发言：“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列宁全集》第 37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21 页。）

<sup>2</sup> 尼古拉·德·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数学家，吉伦特派，大恐怖时期被捕后死于狱中。

<sup>3</sup> 阿那哈尔西斯·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 1755-1794），普鲁士进步贵族，世界主义者。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赴巴黎积极参加革命，大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亦译为“阿那夏尔西·克罗茨”。法国大革命期间，克洛茨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头衔和教名，以古代西徐亚王国王子、古希腊七贤之一“阿那哈尔西斯”作为自己的名字。故此，“Anacharsis”不应按法语译为“阿那夏尔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现代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普遍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sup>1</sup>

资本主义在哪里终结，社会主义就必须从哪里开始。基于“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普遍的相互依赖”的事实，社会主义会以国际规模组织自己的生产力，并能够相应地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当中，国际一体化的要求作为诸多对立趋势之一，是无序地、盲目地、时断时续地发生作用的；在帝国主义之下，它扭曲地表现于强国对弱国的征服和经济支配之中。抓住了资本主义开启却未能实现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会有意识地创造国际交往。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亲密友人来讲，这些都是几乎不言自明的基本理念，没必要为之浪费口舌。《共产党宣言》面世四十多年后的 1890 年，恩格斯在一封致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信中写道：

“你们的伟大的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第一个国际条件。我希望还能看到，这一同盟——将永远结束政府之间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未来欧洲同盟的核心——将为三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实现。”<sup>2</sup>

它鲜明地反映出，我们的官方头脑是怎样地迟钝，以至直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后——距《共产党宣言》面世确有 120 年之久——我们的国务活动家和意见家们才对这类理念略知一二，并提出了它的一种胆怯、保守的版本——或者说应该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即所谓共同市场。

下面这些文字出自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写给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保尔·拉法

---

<sup>1</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2、35 页。这里的中译文据多伊彻的英译文略有改动，并不严格合于德文，下同。

<sup>2</sup> 恩格斯：《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101-102 页。

格的书信，由之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如何一贯拒斥在社会主义当中吹嘘一国自给自足。恩格斯警告拉法格，要反对一种过分拔高法国社会主义并赋予其至高或特殊地位的倾向。

“但是，无论是法国人[他写道]还是德国人，抑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革命的]信号，但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德国；而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即便法国和德国都不能保证最终赢得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件。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件，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法国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由于其他国家的糊涂与怯懦，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知道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导致了拿破仑的出现，导致了征战，导致了神圣同盟的侵略。希望法国在将来也要起这样的作用，那就是歪曲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使法国成为取笑的对象，因为在你们国界之外，人们对这样的装模作样是嘲笑的。”<sup>1</sup>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述这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文字，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为理解布尔什维主义以及俄国革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线索。恩格斯表述了一种传统的精髓之所在，而布尔什维克正是在这种传统之中成长起来的；即便“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西欧移到了俄国，他们仍然将建立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国际进程而非单纯俄国的“事件”。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胜利是世界革命或至少一场欧洲社会主义激变的序幕。事后看来，他们错误地预计，即将发生一场国际革命。但事后的认识未必比一种大胆的（即便部分错误的）历史先见更为清楚明白地看待这些事件。布尔什维克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1914年的灾难开创了整个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纪元和资本主义衰落的纪元。这一前提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其后数十年间实际上充满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竞赛。1918年，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在柏林、维也纳、慕尼黑、布达佩斯和华沙短暂地建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而且即便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恢复自己旧时的稳定。它从危机踉踉跄跄地走向危机，直到1929年世界范围的萧条把它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起初，有产

---

<sup>1</sup>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656页。

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支配地位，答应进行数代社会主义者在俄国革命前徒然为之斗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后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救星而粉墨登场。殖民地的动荡和 1925-27 年中国大革命扩大并加深了危机。而在整个处于第三帝国的阴影之下的欧洲，内战摇撼着奥地利和西班牙，法国则经历了人民阵线时期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些表明，间战期的数十年有着多么巨大的革命潜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危机和瓦解。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人们之所以战斗，不只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独立；许多被占国内战肆虐。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战争的革命后果不过一种历史记录。来自上层的革命则改变了东欧。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社会崩溃。

布尔什维克非常了解自己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纪元。那是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纪元。那么多革命努力或是挫败或是流产，但这并未否定他们行动的前提。参战者并不事先注定失败——斗争的结果是在实际战斗中被决定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惯常随意挑起战斗——实力的考验往往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革命者或许抱持着英国士兵们的传统看法，认为自己或许会输掉除最后一战之外的所有战斗，同时又必须在不得不失败的战斗中奋战。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之所以坚持革命的普世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觉得，俄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是希望渺茫或毫无希望的。孤立于先进工业国并降格为依靠自己的资源，俄国根本不能或无法长期克服经济短缺、文明水平低下和本国工人阶级的弱小；她无法防止官僚的崛起。所有布尔什维克——甚至包括斯大林——最初预计的是，俄国将加入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共同体，而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德国、法国或英国会以合理文明的方式帮助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不会出现与伴随苏联孤立无援的工业化而来的牺牲、暴力和社会不平等相类似的情况。早在 1914 年，列宁的口号便是“欧罗巴社会主义合众国”<sup>1</sup>，尽管他后来虽然没有怀疑这个理念本身，但也怀疑它是否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sup>2</sup>。后来在 1918 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现实了；但它却被分裂为两半：一半，即它的政治条件——通过苏维埃进行的无产阶级统治——已经在俄国被创造出

---

<sup>1</sup> 在 1914 年，列宁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口号，而是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建立德意志、波兰、俄罗斯等共和国，并且把欧洲各个单独的国家变成共和制的欧洲联邦”作为“当前的口号之一”。在这里，欧洲联邦（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Европы，即欧罗巴合众国）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参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 26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6 页。

<sup>2</sup> 指 1915 年 8 月，列宁否定了一年前提出的“欧洲联邦”口号。参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 26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67 页。

来了；而另一半，工业和文化前提，则在德国存在。”<sup>1</sup>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两半”必须合二为一。如果说恩格斯反对拉法格，称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那么列宁则丝毫没有法拉格的幻想。他和他的同志们明白，工人的解放只能是许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说即便对现代资本主义来讲，民族国家的框架都太过狭隘，那么在这样的框架中，社会主义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了。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时代结束前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渗透着这种信念。

此后在 1920 年代中叶，俄国孤立于世界的事实猛地击中了要害，同时斯大林和布哈林出面详细解释一国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苦涩的必然性：俄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sup>2</sup>——这是一种迷住了许多真诚的国际主义者的新学说的合理内核；对此，无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都没有意见。

但是这种新教义的特殊意义却在于其他方面，即这样的事实：它因应不得已的情势而予以利导，代表了一种对革命的普世主义设想的反动。以苏联的孤立为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制造出意识形态孤立主义的口号。他们宣称，得不到其他国家帮助和支持的俄国，不能也不应该只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这对于所有布尔什维克来讲是不证自明的）；而且还能够自力实现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一种摆脱了人支配人的无阶级社会（这最多不过一场白日梦）。他们实际上在说，除非发生战争，否则苏维埃新社会的命运极大地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而社会主义可以且将是一种在国家层面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体系。他们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变成单纯俄国的事件，仅此便使这种解放变得不可能，从而再现了恩格斯的说法。实践意义很快显现出来了。在三十多年里，一国社会主义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官方准则和中心教条，被以一种近乎教会式的方式强加于党和国家身上。怀疑它的真理性便是大不敬，无数党员和其他公民因此而受到开除、下狱和死亡的惩罚。到目前为止，尽管社会主义被认为已经传播于十二个国家，但一国社会主义还没有失去它的准则地位。

---

<sup>1</sup> 列宁没说过这样的话，俄译者回译为《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文字：“历史……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德国和俄国在 1918 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列宁全集》第 34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79-280 页。）

<sup>2</sup> 多伊彻原文为“go it alone”，指在没有他人帮助下独力行事。参见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选集》（上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39 页。

在自给自足的俄国社会主义理念的背后，是默然承认西方的革命前景已然长久暗淡下去。这无疑反映了一种人民的情绪。经过许多年的战斗、饥荒和挫败，人民已经精疲力竭，不再理会党的惯常承诺，即国际革命——西方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力量——很快会来援救他们。新的学说提出了不同的前景：它向人民保证，即便俄国革命永远被孤立，它仍然会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诺言，并在本国境内建立无阶级社会。“这是一种安慰性的学说。”它的杰出阐释者之一欧根·沃尔高<sup>1</sup>私下里如此承认道。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勒索性的学说，因为在一国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人民如今被要求放弃一切公民自由，并承受无穷无尽的巨大牺牲和严重短缺。此外，统治集团成员和整个官僚集团有他们自己在现实政治<sup>2</sup>和国家理性<sup>3</sup>方面的动机。官僚的考量与民族国家绑在一起，被它塑造、受它制约。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官僚如今从革命的英雄主义时期的高峰跌落到民族国家的谷底。他们渴望自己和他们的俄国安全无虞。他们努力维持国家和（尤其是）国际现状，争取与资本主义大国达成稳定的临时协定<sup>4</sup>。他们相信自己能在一种意识形态孤立主义当中达成这一点，并渴望苏联脱离外部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通过宣布一国社会主义，斯大林实际上告诉资产阶级的西方，他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兴趣乏然。而资产阶级的西方也很理解他，甚至考虑要不要完全信任他。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大斗争中，我们的大部分国务活动家和意见领袖认为，如果斯大林获胜，那么西方的利益将得到最好的保障。他代表着缓和与和平共处。

不过，斯大林主义并不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脱离外部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它背负着自己既不能废弃也无法丢掉的革命遗产。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莫斯

---

<sup>1</sup> 沃尔高·耶诺 (Varga Jenő, 1879-1964)，著名的犹太裔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匈牙利革命爆发后，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社会生产人民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革命失败后，沃尔高流亡苏联，并长期在苏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沃尔高的马扎尔文名“耶诺”（马扎尔语的姓名结构类似汉语，是姓前名后）原本出自匈牙利古代部落名称，但19世纪以来被等同于德文“欧根”（Eugen）。故此，沃尔高的德文名为“欧根”。“欧根”和沃尔高的俄文名“叶夫根尼”（Евгений）均为西方常见人名“Eugene”在各自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故在英文文章中，沃尔高的名称虽然一般写作“Eugen Varga”，但有时亦转写为“Eugene Varga”。多伊彻在这里用的后面这种转写形式。人名的翻译应基于相应人物的长期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沃尔高并未长期生活于英语环境中，亦无英语文化背景，故此处中译，不按英文处理为“尤金·沃尔高”，而是按照近乎此处英文写法的德文名译为“欧根·沃尔高”。

<sup>2</sup> 原文为德文“Realpolitik”，指完全以既存现实条件为基础、不受意识形态理想制约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活动。这一与政治实用主义类似的概念最初由德国自由主义政治家路德维希·冯·罗豪（Ludwig von Rochau, 1810-1873）提出。

<sup>3</sup> 原文为法文“raison d'état”，指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存续和利益，能够根据现实考量而采取悖乎道德准则的行动。

<sup>4</sup> 原文为拉丁文“modus vivendi”。“modus vivendi”原意为生活方式，后在政治领域衍生出临时协定的意思，即对立双方达成的临时性妥协协定。

科；国际体现着布尔什维克先前对普世革命的拥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都无法承受解散共产国际——只有在 1943 年，他才敢于办成这件难事<sup>1</sup>。同时，他尽其所能地使之适应于自己的目的。他驯服了它。他使之成为自己的外交助手，或如托洛茨基所言，他将外国共产党从“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转变为苏联的和平主义守边人。各国共产党实际上同意为“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外交利益和国家利己主义服务，因为它已经成为第一个工人国家。他们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便这样会使他们挽回自己的政治尊严和革命效能。他们因此使自己陷于一种自杀性的模棱两可之中：一个仅仅作为一国社会主义代理人而运作的国际在字面上就是一种可悲的语词矛盾。

如果现状是内在稳定的，那么斯大林主义在国际现状的框架中寻求国家安全的做法，则多少会有些意义。但事情并非如此。再没有什么能比间战期数十年间的社会均势和国际力量平衡更不稳定的了。1929 年的大萧条灾难性地打破了社会均势。德国从 1918 年战败中恢复过来，决心推翻《凡尔赛和约》基础上建立的体系，这动摇了军事和外交平衡。俄国无法使自己免于这些形势发展的冲击。但斯大林、他的外交手段以及他那驯顺的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却是为了将她隔离起来，甚至企图预先阻止这些冲击，并拖延或缓和她或将被拖入的外部冲突。这位残忍的大独裁者、这位人们假定的现实政治大师，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克努特王<sup>2</sup>，命令革命、反革命和战争的浪潮停息不动。在苏联的全部力量和威望的支持下，斯大林对于世界共产主义拥有着巨大的权威；他的态度和政策自然也就在一个命运攸关的纪元中极大地塑造了世界历史。没人会说，如果苏联以外的工人运动遵循了自己的利益和传统，不允许（斯大林主义的或其他的）外部影响干扰自身发展的节奏和方向，那么西方或整个世界如今会是什么样子。或许西方先进国家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他们可能会比现在更加接近社会主义革命。

我不认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会如他们如今或许表现得那样不可避免。我也不认为，它们都是由客观状况或我们西方社会的内在“稳固性”造成

---

<sup>1</sup> 原文为法文“coup”。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sup>2</sup> 克努特王（King Canute）即克努特大帝，是 11 世纪初英格兰、丹麦和挪威的统治者。多伊彻这里指“克努特王与潮水”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克努特王佩戴王冠，率领廷臣来到海滩，喝令浪潮停止前行，以免弄湿他的双脚和长袍。但潮水不为所动，继续前进，终于没过了他的双脚。于是，克努特王对廷臣说道，纵然是国王大权，面对上帝的力量时也不过如此。传说原意是称赞克努特王的谦逊。但多伊彻引用此典，则是为了强调斯大林的国际政治操作，如同克努特王企图阻遏潮水一般，是徒劳无功的。

的。至少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挫折是由于主观因素、由于那些被视为社会主义魁首的人和党所推行的错误政策造成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预计到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国际影响之外，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诸多预言，曾经并不像它们如今或许看上去的那样离谱。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现举其中重要者之一，以为说明。任何当代史的研究者都会震惊并或许困惑于 1930 年代初莫斯科对纳粹主义兴起的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斯大林、他的顾问们以及他的宣传家们那时表现得根本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他们毫不知晓纳粹运动的凝聚力和破坏性的干劲。1929-1933 年，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德国共产党犯下了长长一系列致命的错误，使希特勒太过轻易地夺取政权。那么，希特勒在 1933 年的胜利果真不可避免吗？这是由客观状况造成的吗？或者德国工人运动能防止它吗？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在 1933 年，运动不经斗争便向希特勒完全举手投降。无论对于曾控制工会并有超过 800 万选民的社民党人，还是对有着 500 多万追随者的共产党人来讲，都是如此。共产党拥有运动当中最为坚决有力、最富于战斗性的成员。由于他们的政治分量，由于他们的品行对更为消极被动的社民党群众的影响，他们在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是极端重要的。但共产党故意且系统地淡化纳粹的危险，并告诉工人，社民党人或“社会法西斯分子”而非纳粹分子是他们应当“集中火力”对付的首要敌人。社民和共产两党的领导人甚至拒绝考虑任何反纳粹主义的共同行动。他们为何如此是没有任何客观原因的。他们的投降并非不可避免。希特勒在 1933 年轻易取胜并非不可避免。而支持和坚持投降政策，对于斯大林和苏联党来讲没有任何实际好处。他们面对纳粹兴起时的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仅仅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孤立主义情绪，源于其使苏联避免卷入任何外部主要冲突的愿望。为了安全起见，斯大林不允许德国共产党采取任何一种可能造成德国左翼和纳粹主义之间爆发对抗或内战的行动。为了国际现状当中的安全幻象、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幻象，斯大林主义造成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失败，并使苏联面临致命的危险。我们中的一些人在那些年里（即 1933 年前）曾争辩道：纳粹政府意味着世界大战和入侵苏联；德国左翼有责任阻止希特勒掌权；它蛮有机会实现这一点；即便失败了，它也应当着手战斗而非被动接受自己被纳粹分子消灭干净的前景。我们在莫斯科被斥为恐慌和战争的贩子、德国无产阶级和苏联的敌

人。

1933年的投降是马克思主义最惨重的失败。之后的事件和斯大林主义政策则加深了这一失败，而德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还未从中恢复过来。如果德国左翼和（尤其是）德国共产党不允许自己在怂恿之下举手投降，如果它曾有意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那或许就不会有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苏联或许就不会在战场上损失 2000 万人。奥斯维辛毒气室冒出的黑烟或许就不会玷污人类文明的记录。而同时，德国或许会成为工人国家。

斯大林主义对安全的痴迷如何导致灾难性的不安全，意识形态的孤立主义如何持续加剧苏联的孤立，从而理所当然地将苏联的政策带入了更为严重的孤立主义，人们对此可以举出其他例子来。这种恶性循环几乎重现于斯大林主义甚至后斯大林主义外交的各个阶段（只要苏联国家理性还将自己强加于西方工人运动某一重要部门的政策之上）。法国的人民阵线、西班牙内战以及 1939-1941 年纳粹-苏联协议的后果便是如此。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固有能力，斯大林政策的国家利己主义更可以说造成了社会主义力量在西方的一次次失败；而每一次这样的失败对苏联来讲也是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入侵把苏联拖出了孤立状态。工人的解放（当然，以及把欧洲从纳粹支配中解放出来）又一次“只能是国际事件”。参加这场战争的不仅有超级大国的军队，还有许多国家的游击队<sup>1</sup>和抵抗分子。在世界大战之中，展开了一场有着巨大社会革命潜力的国际内战。但斯大林主义继续紧抓住传统安全、国家理性以及神圣的国家利己主义。它把这场战争当作“卫国战争”（另一场一八一二<sup>2</sup>）而非一场欧洲内战来打。它不是用国际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理念来对抗纳粹主义。斯大林不相信，那种理念能够鼓舞自己的军队去战斗，或者如同在干涉战争时那样，感染并瓦解敌人的军队。此外，它还敦促欧洲各种由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仅只为国家解放而非社会主义而战。他所以如此，部分是为了维持大同盟<sup>3</sup>；他正确地认为，如果这场战争有转变为欧洲革命的危险，那么丘吉尔和罗斯福便会退出同盟。但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害怕革命动乱的，后者或许

---

<sup>1</sup> 这里的原文为“guerillas, partisans”。这两个单词皆可指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小股武装力量，即游击队，但意思略有不同。“guerilla”一般指不隶属于正规军的独立游击队；“partisan”则指隶属于正规军的非独立游击队，例如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境内受苏共领导、配合红军作战的游击队。因汉语中缺少对应的名词，故将二者一并译为“游击队”。

<sup>2</sup> 即 1812 年俄国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

<sup>3</sup> 这里的“大同盟”（Grand Alliance）指二战时的反法西斯同盟。

会打乱其独裁统治的基础，即脆弱的苏联国内社会政治平衡。他决心带着一国社会主义和完好无损的独裁统治从大激变中幸存下来。然而战争的逻辑却违背了他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派往十二个国家；即便他们在“卫国”旗帜下进军，也仍然是红军，他们并不容易接受自己以昂贵代价取得的胜利应当如此收场：在他们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所有国家当中复辟资本主义。战争的革命后果就在那里。如何控制住它，如何将它降至最小，这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共同关切之所在。他们秉持传统外交精神来处理同盟问题，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在这里，我们不必探究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出现并开启了冷战的那些复杂冲突。只用指出这一点就行了：即便在苏联前所未有地卷入了如此多国家的事务之时，即便在斯大林不得不以准革命的方式捍卫胜利果实以及苏联在东欧的支配地位之时，斯大林主义仍然忠于它那狭隘的国家意识。东欧的革命不会成为“许多国家无产阶级共同努力而来的国际事件”。它是由占领国及其代理人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不过是一国社会主义的防御斜坡<sup>1</sup>。在西欧，根据雅尔塔和德黑兰的协议，千疮百孔、声名扫地的资产阶级统治得以复辟；当地共产党则协助复辟，参与戴高乐和加斯贝利<sup>2</sup>的战后政府，帮忙解除抵抗运动的武装，并约束工人阶级躁动的激进主义。由此，战后的革命潜能虽然实现了，但却是在整个东欧以扭曲的方式实现的；在西欧则归于乌有。因此，斯大林主义努力造成一种阶级斗争的僵局，以便外交手段足以保障“相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sup>3</sup>。斯大林又一次试图在国际现状（即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达成的势力范围划分）的基础上获得国家安全。但外交手段并不能完全消除德黑兰和雅尔塔的巨头们在他们势力范围边界撒播的巨大争端；它也不能解决核时代陌生的危险。于是世界在阴郁的冷战（不过是由超级大国进行的、堕落形式的阶级斗争）冲击波中瑟瑟发抖。人们再次想起恩格斯的警告：“法国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革命……你们知道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导致了拿破仑的出现，导致了征战，导致了神圣同盟

---

<sup>1</sup> 原文为法文“glacis”，指军事要塞周围人工垒筑的、起到临时防御作用的斜坡。这种斜坡的作用主要在于以斜面弹开敌军发射的例如箭之类的远程武器。

<sup>2</sup> 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 1881-1954），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政治家，1946-1953年担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理。

<sup>3</sup> 这句引文不知多伊彻本于何处。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接受采访时，表达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看法。参见《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3页。

的侵略。”俄国单独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一不再详地接近导致相同的后果。

但是，俄国单独领导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战争的革命后果总归没有被完全控制住。南斯拉夫没有遵从俄国的领导；胜利的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暗地里与之对抗。但即便革命的传播也没有治好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国家利己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斯大林后继者的政策仍然继承了这些疾病。即便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已久，但它背后的情绪以及它所造成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作风仍然继续存在着。

不过，现在或许可以简要考虑一下苏联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另一重影响。在1917年后的头几年里，十月革命的讯息在西方工人运动当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例如，1920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以及德国独立社会党<sup>1</sup>（当时德国左翼最有影响的实体）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大多数表决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即便在保守的英国，伦敦码头工人在欧内斯特·贝文<sup>2</sup>的领导下，也拒绝装载供波兰军队对苏作战的军火，以示同情新俄国。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西方工人运动仿佛已经使自己跳出了1914年陷入的泥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再次使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摆脱了绝望的深渊，并用对胜利的信心和对社会主义的新希望鼓舞抵抗运动。但总的来讲，在这半个世纪里，苏联的榜样远未能鼓舞西方工人运动，反而使它们断绝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抱负。

悖谬的是，造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工人将俄国革命视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大考验。他们并未意识到苏联负担着可悲的困难。无论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这些困难有着怎样的说法，无论他们如何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一个饱受贫穷之苦的半野蛮国家里，无法形成自由的无阶级社会，但对于我们的大部分工人来讲，这些都是抽象理论的细枝末节。对他们来讲，社会主义在俄国如今不是理论思辨而是实践经验的问题。显然，鼓励夸大的期望并不合乎苏联的利益。意识到自己责任的苏维埃领袖们本可以像列宁过去常做的那样，认真尽责地解释这一点；他们本可以明确表示，即便苏联的伟大成就也不是真材实料的社会主义，它是且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措施。由此他们或许可以避免培植幻想，并防止出

---

<sup>1</sup> 原文如此，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sup>2</sup> 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1881-1951），英国工会活动家、工党政治家，曾任丘吉尔政府的劳工大臣和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1920年夏，担任码头工人工会领导人的贝文组织了拒绝装载供给波兰军队军火的运动。不过，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贝文积极推进遏制苏联政策、促进英美合作，并致力于加强英国对东南亚和东亚的控制。

现后来的幻灭；并且他们或许可以使西方工人运动意识到自己对于苏联的孤立和困境的共同责任。但斯大林和他的伙伴们太过关心国家尊严和官僚威望，因而无法这样做。他们给不仅俄国而且全世界的工人提供了自己的“安慰性的教条”，即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神话。

作为传播这种神话的后果之一，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变成单纯的看客。既然俄国人宣称他们单靠自己就能很好地实现甚或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西方人民除了旁观俄国人如何进展之外，便无事可做了。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述说着社会主义在苏联创造的奇迹。热心和单纯的人信以为真。绝大多数西方工人则或者加以琢磨，或者暂不下定论，或者抱持消极否定的看法。对苏联的贫穷、饥荒和恐怖统治的描述培育了怀疑主义。各国共产党积极捍卫的大清洗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引发了反感。大批美国、英国和法国士兵在被占领的德国和奥地利与他们的苏维埃盟军建立联系，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最后在 1956 年出现了赫鲁晓夫揭露的冲击。数年之间，几百万西方工人仔细考虑这些经验，并得出“社会主义不行”和“革命一无所获”的结论。许多人陷于政治冷漠；许多人则向西方的社会现状妥协，战后繁荣和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使后者变得更加可以忍受。曾信仰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终指责“上帝辜负了”<sup>1</sup>他们。一国社会主义的神话由此培育了一种更具欺骗性的、有关社会主义失败的巨大神话。这种双重的神话主导着西方的诸多政治思考，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 1917 年半个世纪后世界仍处其中的意识形态僵局。

但在看待这一结果时，西方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自诩正义。因为当一个俄国人查看西方与俄国的关系记录时，他能发现什么呢？掠夺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同盟国对苏武装干涉、封锁、**防疫隔离带**<sup>2</sup>、长期的经济和外交抵制；然后又是希特勒的入侵和纳粹占领下的恐怖、俄国的盟友们精明地长期拖延开辟反希特勒的第二战场（而此时苏军正在战斗中付出牺牲）；而在 1945 年后，则是同盟关系的迅速反转、核讹诈以及冷战的反共狂热。这是怎样的记录啊！这是怎样的记录！

---

<sup>1</sup> 原文为“God that failed”，在此或为一语双关：一方面与后文“them”相接，表示“上帝辜负了”的意思；另一方面暗指《失败了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一书。这本出版于 1949 年的文集收录了 6 名前亲苏知识分子的转向忏悔文，旨在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幻灭。

<sup>2</sup> 原文为法文“cordon sanitaire”。这里指克里蒙梭在 1919 年提出的一项外交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将一战后独立的诸中东欧国家组成为对法友好的防御联盟，以隔绝苏俄-苏联和德国这两个在法国当局看来感染政治疫病的国家，从而保障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这项计划在 1920 年代得到了实施。

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问，为什么西方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党允许对上述记录负责的政府和组织拥有如此广泛的倡议和行动自由。在这五十年的进程中，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未能激烈介入、未能使西方以迥然不同的方式面对俄国革命；对于其中可能的客观原因，史学家必须加以探究。他也必须顾及俄国长期单独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但即便仔细考虑了全部客观状况并做了必要的顾及，他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恩格斯曾谈到过法国单独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有害后果，并的确仔细分析了时代的客观状况。他用这些平实而意味深长的寥寥数语总结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其他国家的糊涂与怯懦，”他说道，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恩格斯是否不得不对我们的时代做出同样的裁决？

## V. 苏联与中国革命

在这场讲座中，我原本计划讨论俄国革命对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影响。但着手这一主题后，我才发现它的涉及面太广、太多，以至如此短小的篇幅是难以应付的；所以我会仅限于一个此前已有所关注的问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俄国革命的产儿。我知道，一些汉学家会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我也乐于承认，他们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显然，这种级别的历史现象在本国本土和产生它的社会状况中有着极为深刻的根基。这一点是需要大加强调的，尤其因为直到最近，西方还是习惯于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当成某种意义上的俄国傀儡。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把它当成一种封闭于自身的运动，仅能从本国环境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决不能让长城支配我们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之前我曾试图追溯俄国革命和西欧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诸多渊源关系。我曾向你们转述列宁如何坦承俄国革命欠着西方的债，并曾引用托洛茨基有关欧洲“把自己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出口给俄国”的文字。现在，俄国革命之于中国的影响，较于西欧之于革命俄国，更为直接和巨大得多。

俄国革命胜利时，中国革命正陷于一条死胡同之中。当中国人在 1911 年推翻满人王朝时，他们试图通过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他们的尝试失败了。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她那些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立刻愈发严重起来。国家越来越陷于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军阀和买办把它撕成了碎片；而农民、穷人和被压迫者则没有机会改变或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纯粹资产阶级革命表明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对此，它的领袖孙中山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此后在 1919 年，发生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伟大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和反对中国永久受列强支配的运动。尽管受到中国共产党未来创建者陈独秀的鼓舞，但这仍然是一次复兴“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尝试。那次运动也陷入了死胡同。次年，发生了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件：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二大号召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起来或准备革命。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开始了向中国的大“进口”；俄国军事技能和技术的引进则紧随其后。俄国以亲身实例向中

国展示了走出僵局的道路：中国也必须超越纯粹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激进分子面前突然打开了新的前景——反对帝国主义、土地再分配、产业工人领导革命、组建共产党并与苏联紧密结盟。尽管不无顾虑，但对于这些新目标，其中一些孙中山也是赞同的。

到那时为止，马克思主义几乎在中国毫无影响。上海、广州和北京的知识界曾稍微接触过费边社和卫理会社会主义的一些零星观点。但只是到 1921 年，七十二年前首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才第一次以中文面世。<sup>1</sup> 西欧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先进工业国阶级斗争的专注，几乎很难在半封建的农民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共鸣。中国人是从俄国和俄国的版本那里得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如爱·哈·卡尔在他伟大的《苏联史》<sup>2</sup>中所正确指出的，是列宁第一次制定了一份与东方民族直接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具有民粹派一般的、对农民问题的敏感，以及对反帝斗争意义之所在的完全原创性的把握。

布尔什维主义既面对西方也面对东方。我们已经看到，面对西方并考虑那里的社会主义前景时，列宁坚称，民族国家对于社会主义转型来说是太过狭隘的基础。到 1924 年，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宣言都以呼吁建立欧罗巴社会主义合众国结尾。但在东方，情况则不然。它的各民族仍然生活于前工业甚至前资产阶级时代，并因半封建的地方主义、部落父权制、种姓制和军阀主义而支离破碎。如果对西方来讲，民族国家这一过往的伟大成就已成为进步的障碍，那么对东方各民族而言，这一成就仍然有待未来的实现，并且是进步的本质条件。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那么东方为了实现它则必须超越资产阶级革命。这是莫斯科在 1920 年代初广为传播的伟大新经验。即便如此，在莫斯科看来，中国革命或其他东方革命并非单纯的民族斗争而是国际进程的一部分，而西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则引领着全世界的斗争。布尔什维主义把自己的经验投射于世界场景。在俄国，城镇和农村都发生了革命；但起指导作用的倡议、思想和意志却来自城镇；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一点会在全球范围内重现，其中工业的西方是放大的“城镇”，而落后的东方则是“农村”。

---

<sup>1</sup> 我在《历史的反讽》中有一篇关于毛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人回忆称，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宣言》的片段就已被译成中文，并似乎发表在一份小期刊上。毛泽东那一代人和毛本人实际上仍然直到 1921 年才能读到《宣言》全文。——多伊彻注

<sup>2</sup> 即《苏维埃俄国史》（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下一次中国革命发生于 1925-27 年，它似乎证实了这一预想。那时，该国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斗争，即有记录以来最长久、最顽强的矿工罢工和 1926 年总罢工，震动了英国。在中国，社会力量的同盟关系与俄国模式颇为类似：农民造反点燃了农村；但城镇工人是革命的推动力。重提这一重要但如今或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事实是有必要的。不幸的是，中国近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毛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做了类似的重写；并且不仅许多历史人物已成为奥威尔式的非人<sup>1</sup>，而且整整一个社会阶级——1920 年代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被从历史记录中删去，成了一个非阶级。我们马上能看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920 年代革命的命运是足够悲剧的。它不仅被打败了；而且在失败之前，还被推回到列宁主义刚刚展示了其出路的、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僵局。是斯大林及其在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把它推回那里的。我们在西方不必依赖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对历史的“重写”；所以我假定你们熟悉这些事件的大概轮廓；而我在这里只会回顾斯大林以这样的理念为中心的政策：中国革命的目标必须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应当以所谓“四阶级联盟”为基础。实际上，莫斯科迫使不情愿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条件服从国民党的指导和纪律、接受蒋介石将军成为国家的领袖和英雄、克制鼓动农村造反并最终在 1927 年解除了城市起义工人的武装。由此，亚洲首次成功的无产阶级大起义——上海公社遭到了镇压。随之而来的是对共产党人和起义工人的全面屠杀以及革命的惨败。

据说，即便没有斯大林的政策，1925-27 年的革命无论如何都因其内在的“不成熟”而注定失败。史学家在验尸时，不能像这样把事件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与人的政策和举动割裂开来；他不能说，这些因素决定了斗争的结果。事实上无论革命在 1927 年的失败是否不可避免，斯大林主义都尽其所能地造成了它。对破坏或扰乱现状的恐惧以及避免深深卷入可能造成“国际复杂化”的、外国社会的严重冲突的愿望对斯大林政策的推动作用，在东方是不下于西方的。同样在东方不下于西方的是，斯大林主义致力于造成一种阶级斗争的僵局。

但在中国，僵局是不可能的。城市的革命虽已被摧毁；但反革命无法巩固它的胜利。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分崩离析。农民继续造反。国民党政权并不稳固而且腐败。之后，日本持续十五年的入侵一次又一次打击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政权。分

---

<sup>1</sup> “非人”（unperson）出自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指因官方抹杀而仿佛不存在的人。

崩离析的进程是不可遏制的。

但 1927 年的失败和随后的事件给革命设置了既非常不同于 1920 年代、也迥异于 1905 和 1917 年俄国模式的场景。在 1920 年代末党员遭到屠杀后，共产党发现重建自己的城市据点是极为困难的。1930 年代，已经征服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人开始在被占城市进行强制去工业化、拆毁工厂，并由此使城镇工人阶级四散而去。但即便在此之前，毛就已敦促共产党离开城市，将自己所有的能量投入将在农民骚动的农村地区发动的农民战争。许多年后，他的政治战略归结为这样的名言，即中国的革命绝不是从城镇到农村，而是从农村到城镇<sup>1</sup>。

这一战略是不是政治天才的灵光一现？或者是冒险家的孤注一掷？它最后的胜利使之仿佛前者。但就当时的状况来讲，这确实是一次可疑的赌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主义的莫斯科都把它当作一种无害的越轨，甚至都不算理应逐出教门的异端。毛外在地履行了全部的斯大林崇拜仪式，从而顺带报答了这种纵容。正如斯大林所见，毛的游击队尽管开始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把革命从农村带到城镇，并推翻国民党。斯大林乐于把他们作为与蒋介石交易的筹码而加以利用；因此他在共产国际的报纸上给他们做了一次有些廉价的宣传，除此之外便没有给什么援助。他把毛视为自己棋盘上一枚古怪的卒子，将它置于一个不甚重要的角落。

而实际上，毛的战略要取得成功，需要诸多条件不寻常地结合起来或者恰巧同时存在，这是他既未曾也无法预料到的。日本侵略和占领的十五年（在那十五年里，中国四分五裂，陷入混乱）、世界大战和日本战败使毛的游击队得以生存和壮大，并使国民党达到崩溃的节点，以至一支农民军就可以将它推倒。正常情况下，在我们的时代——并且即便在落后的中国也已如此——城镇在经济、行政和军事上对农村的支配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把革命从农村带到城镇的尝试事先就注定失败。但在 1948 和 1949 年，当游击队进入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北京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填补真空。国民党彻底瓦解了。即便在 1948 年，斯大林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那时他还在徒劳地敦促毛与蒋介石和解，并同意将游击队并入蒋的军队。又是害怕“复杂化”——害怕美国大规模干涉毗邻苏联边境的

---

<sup>1</sup> 参见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的说法：“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6 页。）

远东地区——斯大林（在 1948 年！）仍然试图重演 1928 年的中国现状。

与此同时，革命的性质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已经发生了剧变。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毛的党与列宁或斯大林的党鲜有相似之处。列宁的党深深地扎根于工人阶级。毛的党几乎仅以农民为基础。布尔什维克曾在沙俄半遮半掩的多党制中成长起来，并曾习惯于和自己的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和其他）激烈论战。而完全孤立于世二十余年的毛主义者，则扎根于他们的山寨、洞穴和村庄之中，已经变得完全内向了。他们没有需要与之直接论战的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他们针对国民党的论战文，在性质上是用以攻击敌人的战争宣传，而非与强劲对手的意识形态论争。党的干部组成为游击队的指挥集团。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服从于武装争斗的迫切需求。组织、纪律、思维习惯、日常事务的处置都军事化了。他们的军事主义尽管是非常规的和革命的，但仍然与布尔什维克党主要的平民色彩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布尔什维主义通过一系列漫长而痛苦的政治和道德危机、在镇压了许多内部反对派之后才变得庞然一体，那么毛主义则很少需要在自己队伍中进行镇压；它的庞然一体性是一种自然而然、无需强迫的成长过程。因此，尽管毛主义外在地模仿斯大林主义，相似性还是掩盖着深刻的差异。

汉学家们常常将毛的游击队比为各个时代为了使自己的领袖即位称帝而起义推翻王朝的中国农民军。毫无疑问，游击队在某些方面是这些军队的后裔。在中国，革命也折射着过去——带着官宦传统和农民起义传统的过去。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旧俄国凶狠的野蛮状态的混合体，那么毛主义则或许可以被视为列宁主义与中国原始的父权主义和祖先崇拜的混合体。无论如何，较于 1920 年代的城镇共产主义，毛主义更深地渗透着本土的风俗习惯。即便从文学角度比较一下毛和陈独秀（毛之前党的领袖）的文章，都能看出这种差异：毛的习惯用语较陈独秀更为古旧，后者的文字更接近前斯大林时代欧洲的（尤其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以古典官宦风格写诗，不是没有原因的）

尽管过去或许对现在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对此也不必加以夸大。在中国正如在俄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与本土原生传统的混合是过渡时代的现象。那些或削弱或摧毁了风俗习惯的力量转型，所带来的痛苦遍及整个社会。统治者到处利用传统来根除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大众教育

如何使斯大林主义的混合体成为苏联社会不可接受的东西；并且或许可以认为，苏联至少在这一方面预示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的面貌。

无论如何，毛的游击队不像旧式农民叛军，没有将中国社会的父权结构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他们是一场无法局限于资产阶级限度内的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并且他们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实际上创造了始于 1917 年俄国的国际剧变的伟大的第二幕。

他们何以能够创造它？在俄国，双重革命是一场主要由产业工人在他们真正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展开的荷马式斗争的结果。我们知道，毛的党与工业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后者在 1948-49 年的各种事件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农民支持土地再分配和私有财产。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则因国民党的腐败和涣散而灰心丧气、士气低落，他们怀抱着这样的希望，即毛主义不会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总之在 1948-49 年，中国没有哪个基本社会阶级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

在着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时，毛主义者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托管人和监护人，这是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仅仅几年之后便承担的角色。由于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毛主义者不是身后没有任何社会阶级的、孤立的革命精英。但农民——它的个人主义聚焦于农村经济——最好也只不过对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

毛主义者大大超越了农民视野，这背后至少有三种动机：(a) 他们早年形成期所做的意识形态承诺；(b) 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 (c) 国际安全形势的要求。在年轻时，他们受到了列宁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吸收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浸没于中国农村的几十年里，这些理念对他们几无用处，而且他们还支持农民的个人主义。但在作为中国的统治者而重新进入城市后，他们不能容许自己受到这种个人主义（用城里的话来讲，即私人经营的工商业）的指导。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建立集权政府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他们无法将这种努力根基于对西方压力毫无招架之力的、发育迟缓的本土资本主义。工业和银行业的国有化为民族独立和一体化的国家、为工业化和中国重新成为大国提供了更为安全的基础。尽管这些目标在理论上与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相符，但在这个世纪里，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无法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典型的是，毛没有无偿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他迄今都在以长期分红的方式付给他们补偿金，并且

赋予他们以经济管理职务。但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损害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最终,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考虑促使中国倒向苏联。直到胜利时,毛主义者都在与以美国将军为“顾问”并装备了美械的国民党军作战;他们有时也不得不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交战。美国支持作为反革命逐鹿者的蒋。冷战正在走向它的顶峰;世界则划分为两个阵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安全有赖于与苏联的联盟和苏联的经济援助;这样一来,她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就有必要参照苏联加以调整。

新中国与苏联结成亲密盟友是不容易的。含糊不明从一开始就笼罩着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关系,并使其陷于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主要是由斯大林政府的国家利己主义造成的。即便毛和他的同志们有意忘记斯大林在 1920 年代如何利用他们、在后来又如何对待游击队并阻碍他们最终夺取政权,他们也无法轻易接受日本战败以来俄国人在远东的立场。俄国人重新建立起自己对满洲的支配地位;他们占据了远东铁路<sup>1</sup>和旅顺口,并将满洲的工业工厂作为“战利品”拆除带走——满洲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工业基地,她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莫斯科有意放弃自己对苏维埃蒙古的控制,尽管此前所有的苏维埃领导人多次庄严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整个蒙古将与中国结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所有这些正在造成一场远比斯大林和铁托才刚陷入的冲突更为严峻的冲突,它是那样严峻,以至将在十年后使赫鲁晓夫和毛反目成仇。可是在 1950 年,无论斯大林还是毛都无法承受闹翻的代价。斯大林唯恐促成毛主义者和铁托主义者的共同战线;而毛则如此渴望获得苏联的善意和援助,以至与斯大林达成妥协并订立联盟。苏联成了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担保人。

当然,资产阶级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的矛盾、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所固有的矛盾,所有这些曾困扰过俄国革命的矛盾,也存在于中国革命当中。相似的境况造成了相似的结果。因此,尽管存在差异,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是有所类同的。它们都作为权力的垄断者、作为社会主义利益的监护人和托管人而在一党制当中活动,尽管没有任何多党制的实际经验和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毛,在扮演那样的角色时,比斯大林更缺少罪恶感并且轻松得多。同时像斯大林主义那样,毛主义反映着它的本土环境的落后性,而后者需要革命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加以消化和克服。

---

<sup>1</sup> 这里当指长春铁路,即中东路铁路。

尽管存在种种含混不明，但这一联盟给双方都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好处。斯大林不仅获得了中国对苏联单独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可；而且还通过特殊的苏中合资公司，得以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运作。这些合资公司必然伤害到许多中国人的感情。他们觉得，这些公司仿佛旧式西方特许权的翻版。但是，多亏苏联的援助，新中国才不会像 1917 年之后许多年里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那样被世界孤立。西方的封锁不能给她造成当年俄国那样大的困难。中国一开始就不必沦为依靠自己极不充足的资源。苏联的工程和科学-管理顾问以及苏联对中国专家和工人的培训，使中国的工业化开端更加轻松，为她减轻了原始积累的负担，并加速了她的“起飞”。结果，虽然中国起步于更为低下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发展状况，但却不必像俄国那样，为开拓社会主义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毛的政府不必像斯大林政府那样大量地削减农民的收入，以便为工业化提供力量之源；它也不必使城镇消费者的粮食配给保持那样低下的水平。这些状况（以及其他我在此未能提及的状况）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在革命最初十年的中国，（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并不像当年俄国那样紧张。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两个大国建立甚至更为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在斯大林死后，他的继承者解散了合资公司、宣布放弃直接控制，并免除了大部分斯大林给援助附加的羞辱性条件。确实，那时似乎有望建立例如一个从中国延伸到易北河的社会主义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当中，三分之一的人类会在广泛的合理劳动分工和产品与服务的频繁交换的基础上，共同计划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或许终于开始转变为“一个国际的事件”。

由于诸多成员国在经济结构和生活水平、文明程度和国民传统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样野心勃勃的任务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裂痕——社会主义革命从过去继承的最沉重的遗产——无论如何都会表露出来。穷国，首先是中国，一定会施加压力，要求拉平联合体内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他们的要求必然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日益增长的消费期望相冲突。但对于一种在经济上超越民族国家的严肃的社会主义尝试而言，这些不应该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广泛的劳动分工和频繁的交流一定会给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带来相当的好处，一定会节省资源和能源，一定会为大家创造新的财富边际和经济活动空间。

除了一国封闭自足和官僚自大的惰性之外，没有什么会阻碍实现这样的蓝图。

在此前谈及官僚的思考如何与民族国家密切相连、如何被它塑造和限制的时候，我曾说过，即便革命的传播也无法治愈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国家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孤立主义，并且斯大林后继者的政策仍然继承了这些弊病。即便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失去意义已久，但在其背后的情绪、它所激起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作风仍然存在着。这一点在俄中关系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我在这里只提及其中一个事件，即赫鲁晓夫政府在 1960 年 7 月突然取消了全部对华援助并从中国撤回所有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这对中国的打击，或许比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所带来的短暂且剧烈的影响远为残酷得多。由于专家和工程师奉命不给中国留下任何苏联的建设计划、蓝图和专利，大批中国工业项目突然陷于停顿。中国人已经为在建工厂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投资被冻结了。大量安装了一半的机械和烂尾建筑任凭锈蚀腐坏。对于一个饱受贫穷之苦、才刚刚开始装备自己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损失可谓伤筋动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打断了大约五年，其遭受减速的时间则更长。数百万工人被迫无事可做、经受穷困匮乏，不得不回到村庄，而那时后者正饱受旱涝歉收之苦。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列宁在 1922 年一篇遗作中不寻常的预感，他担心“杰尔日莫尔达——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和欺负人的官僚”的行为有一天会影响“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

毛主义者已经用自己的硬币、用国家利己主义的硬币偿还了俄国人的债务。此后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的论战中，我们从中国听到的是越来越缺乏理性的论述，以及越来越多的被侵犯与被激怒的国家自尊心的叫喊、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叫喊。1960 年创伤性的冲击把毛主义者对俄国人郁积已久的、被压抑的愤慨全部搅动并释放了出来。它正迫使他们展现出自己的某些消极特质，尤其是他们由来已久的东方自负和对（他们开始把苏联视为其中一员的）西方的蔑视。

这场冲突的核心在于，两个大国对于国际现状的不同态度。俄国人这些年里继续在国际现状中寻求国家安全。我相信，足够显然的是，这一政策并非斯大林的后继者的创举；毛主义者所斥责的并非“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成就。这种修正主义在根子上是斯大林主义的；它回到了 1920 年代和一国社会主义。自那时起，苏联的政策就在不惜一切代价努力避免冒险深度卷入外部世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冲突。无论它的动机如何不同，无论时代状况如何变动，它对这一点的专注却是一以贯之的。斯大林先是在二十多年里使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战术，而后

又在 1943-1953 年间使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利益，服从于它。在对华关系中，斯大林首先是在 1927 年然后又在 1948 年留下了各种“修正主义”记录。在对安全的追求中，他一贯试图维护甚至稳定任何一种现存国际力量对比。由于活动于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他不得不按照全新的现状调整自己的政策；他以一种本质上保守的方式一再这么做。在 1930 年代，他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即人民阵线政策，以维护正遭受纳粹主义威胁的凡尔赛体系。1939-1941 年间，他根据第三帝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调整了”自己。最后，他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使之适于维护由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定创造的现状。斯大林的后继者试图维护的正是这种现状或者说它的存留物，以免有力量从内部扰乱它。

可这种现状对新中国来讲，却是必然不可接受的。它可以追溯至中国革命之前的时代，以默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为基础。它不考虑中国革命及其结果。正是在这种现状当中，中国成了国际外交的法外之徒，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遭到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封锁，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并且受到经济抵制。莫斯科以核战争的危险为由，渴求稳定这一现状，必要时可以默然中止阶级斗争和反帝“解放战争”。中国有各种理由去有限地鼓动亚洲和其他地区敌视现状的力量。她无意中止阶级斗争和解放战争。因此俄中两国的政策在根本上是不协调的。因此半真半假地大声争吵修正主义问题。因此一当俄国人寻求与西方和解，便被指责为与美帝国主义结盟反对中国革命和诸多仍然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因此中国最终起而挑战俄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领导地位，毛主义者要求获得领导权。

但毛主义似乎具有双重的灵魂：一重是国际主义的，另一重则似乎充满了东方的自负。他们反对现状、反对俄国的强权政治，因而采取激进立场，用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口号和标语发声反对莫斯科。但他们自己的背景和经验、他们沉浸于本国社会环境的落后性、他们对自己民族国家新兴的（但也足够古老的）自豪感、他们在自己史诗般的斗争中所赢得的奖品、他们在工人阶级或任何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缺乏深刻的根基——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具有了像斯大林主义者那样浓厚的狭隘国家意识和神圣利己主义；他们于是也倾向于使外国共产主义运动或革命运动的利益从属于自己的国家理性和强权政治。甚至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打着斯大林主义的烙印，即一种封闭于他们自己长城之内的一国

社会主义的形象。<sup>1</sup>

毛主义如何被自身的矛盾猛烈撕扯，与苏联的冲突如何引爆了它内在的紧张关系，如今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这个“革命的中心”正在输出新的震动，它们撼动了整个中国社会、触及苏联并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些震动将会造成什么？会像所谓红卫兵的鼓动者所承诺的那样，是一个更平等、更不官僚、由人民群众更直接地加以控制的政权，即比迄今的苏联当局更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吗？一场复兴的、更加纯洁的革命？或者我们在 1965-66 年目击的大动乱只是一种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典型的、在人和政党无力控制政治钟摆的剧烈摇摆时出现的非理性的混乱？红卫兵月复一月地群集于中国城市的广场和街头，他们会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新激进派或者新掘土派和新平等派吗？他们最终会取得胜利吗？还是说在乌托邦的热忱和活动迁延日久之后，他们会筋疲力尽地把舞台丢给那些不可一世的法律与秩序的救星？或者我们所有的历史先例可能都与这场戏剧无关？无论答案如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和社会主义方面之间的冲突仍然悬而未决；它变得比其在俄国时更为深刻。一方面，隐现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因素更为庞大，代表着它的是仍占国民五分之四的农民和大量有影响力的城镇资本主义幸存者。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潮流反官僚、争平等的动力在俄国虽然存在已久，但也没有其在中国时的这样强劲。这些广大人民群众卷入其中的对立与碰撞，伴随一种暴烈的自发性而发展了一段时间。这种自发性是苏联自其早期以后便闻所未闻的，让人想起 1794 年雅各宾派内斗时骚动的巴黎群众。无论这一惊人的景象如何终结，无论它可能将苏联和中国推向怎样的新十字路口，这些事件的一个教训是清楚明白的：就像不能是单独俄国的事件那样，废除人支配人也不能是单独中国的事件。它只能作为一次真正国际的事件、作为一件普世历史的事实而得以实现。

---

<sup>1</sup> 这就是为什么，毛多年来致力于与苏加诺将军的政府保持友好外交关系，并怂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接受苏加诺的领导、宣布放弃一切独立的革命行动，以维护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毛对于印尼共产主义的作用因此非常类似于 1920 年代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作用；而其结果甚至更具灾难性。——多伊彻注

## VI. 总结与展望

这次对半个世纪苏维埃历程的概览已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应当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俄国革命是否满足了它所激起的期望？它对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可以明确而断然地回答“满足了”，并用一种得体的胜利口吻来结束自己的评论。不幸的是，这是我无法做到的。但悲观沮丧的总结也是没有道理的。在许多方面，这仍然是一场未结束的革命。它的记录绝不简单，而是一并包含着失败与成功、落空的希望和达成的期许——而谁能将这些希望和期许加以比较呢？哪里有天平可以称量如此伟大纪元的成果和挫折，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既成比例？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成功和失败不仅巨大而且始料未及，它们一面相互依赖一面又处于鲜明的对比之中。这令人想起了黑格尔尚未过时的格言：“历史不是幸福的领土；……各个幸福的时期是它的空白页”，因为“即便在历史当中不缺乏满足，但由实现伟大目的而来的满足超越了任何特殊利益，这和通常所谓的幸福是不一样的。”<sup>1</sup>当然，这五十年并非历史的空白页。

“俄罗斯是一艘注定要远航的巨轮。”<sup>2</sup>从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这句名言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暗含着的、强烈的国家自豪感。一位俄国人如果用民族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半个世纪的记录、将革命视为单纯俄国的事件，那么他会有充分的理由甚至感到更加自豪。俄国如今是一艘更为巨大的轮船，行驶于遥远得多的航线中。单从国家实力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许多人仍然会从这一角度看待——苏联的资产负债表是绝对令人满意的。每念及此，我们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必然满怀嫉妒。但据我看来，在这一代俄国人当中，似乎很少有人会自始至终欢欣得意地看待它。许多人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即1917年十月革命不是一起单纯俄国的事件；而即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也未必把国家实力视为历史的**最终论据**<sup>3</sup>。大部分俄国人似乎既注意到了这个时代的悲惨，也了解它的伟大。他

---

<sup>1</sup> 这里是按多伊彻的英译文译出的，并不严格合乎黑格尔原文。参见《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1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沈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3页。

<sup>2</sup> 这句话出自勃洛克的随笔《知识分子与革命》。参见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林精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sup>3</sup> 原文为拉丁文“ultima ratio”，取自“ultima ratio regum”（国王的最终论据）。国王与人发生争议时，在所

们看到了本国经济异乎寻常的扩张动力、与日俱增的大量超现代巨型工厂、不断扩大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网络、苏维埃技术的伟业、太空航行、各种社会服务惊人的扩大以及等等；并且他们还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生机与活力。但他们也明白，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讲，日常生活仍然只是一种单调的苦差事，这一点嘲笑着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宏伟壮观。

例如，尽管已进行了大量住房建设，人均居住面积仍然只有 6 平方码<sup>1</sup>。鉴于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这就意味着许多人仅有 5 或 4 平方码，甚至更少。均值仍然停留于斯大林时代末期。如果回想到仅在最近十五年里，城镇居民人口的增量就相当于不列颠群岛人口总数，那么上述情况就不足为奇了。但这样的统计数据对于那些苦于极端过度拥挤的人来讲，并不能带来多少解脱或安慰；尽管情况一定会逐步改善，但改进过程仍然漫漫无期。住房状况所体现的努力与成果之间的比例失调，是苏联生活在许多方面的典型特征。在太多的领域里，仅只为了使自己留在原地，苏联就必须极速奔跑、与人激烈竞争。

西方旅客震惊于俄国人对物质品和生活舒适的强烈的、近乎迷恋般的专注，常常因此而谈论苏联心灵的“美国化”。但这种专注的背景显然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整个“生活方式”和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在鼓励人们专注于物质财产，同时商品广告对此又不断地加以猛烈刺激，以诱导或维持人为的消费需求、防止生产过剩。苏联对物质商品的渴望所反映出的，是数十年的生产和消费不足、对短缺和贫困的厌倦，以及人们普遍觉得这些最终可以被克服。这一普遍的情绪迫使统治者较于以往更加关心人民的需求及其满足；就此来讲，它是一种促进了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进步因素。但由于苏联的生活方式并不适于个人财富积累，因此“美国化”是表面的，很可能只是当前这一由短缺向丰裕缓慢过渡的阶段所特有的。

这半个世纪的伟大和悲惨也以不同方式影响到苏联的精神和政治生活。和十五年前苏联所处的恐惧和恐怖之国相比，如今几乎可算是自由的国土了。过去的集中营消失了。在这些营地里，囚徒们还没明白自己为何受罚，便像苍蝇一样死去了。普遍存在的恐惧消失了。这种恐惧曾造成国民的原子化，使人人害怕甚至

---

有其他论据都被用尽而依然无法说服对方后，便以武装力量迫其屈服。故此，诉诸武力被称为国王的最终论据。

<sup>1</sup> 约合 5 平方米。

与亲朋好友联络，并把苏联变成了对外国人来讲确实不可触及的国家。国家正在恢复它的头脑和言语。进程是缓慢的。人民并不容易摆脱几十年来由铁板一块的纪律而形成的习惯。变化依然惊人。如今各种激烈争议（虽然常常遭到掩盖）搅动着苏联的报刊；而且普通人也没有被严厉禁止向完全陌生的人甚至敌国游客（他们的好奇心未必一定没有害处）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思想和感受。但苏维埃公民还是经常因自己生活在相对温和的官僚监护之下而感到苦恼，仿佛自己从未烦闷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他觉得，自己的精神自由也被限制在像他那可悲的6平方米一样的东西之中。人们不满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尤其当后者颇为可疑或充满了半成品的时候——这是人性的崇高品格之一。这样的不满是进步的动力。但就像有时在苏联那样，它或许会导致灰心丧气甚至徒然无果的犬儒主义。

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俄国人也经常感到自己为了留在原地而极速奔跑。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苏联赢得了半吊子的自由，而这确实可以比甚至彻底的、密不透风的暴君专制更令人痛苦。最近的苏联著述（其中一些在苏联出版，另一些则在国外出版）已经表达了由这种事态产生的羞辱感，它有时培育了阴郁的悲观主义甚至仿佛“等待戈多”式的情绪。但在这里，苏联和西方现象的相似性或许也是欺骗性的。近期相当多苏联文学作品中所充斥的绝望，很少源于“人的状况的荒谬性”这种形而上学感受。它往往或暗或明地表达出一种困惑于苏联政治生活种种极端不正常状况（尤其是官方去斯大林化的模糊性）的愤怒。和最近西方那些变着法子重弹一切皆空<sup>1</sup>老调的作品相比，这些著述的精神更加积极、更具有讽刺性和战斗性。

官方去斯大林化的失败是这种不安的核心之所在。自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以来，已过了十余年。只有在此之后真正澄清它所引起的诸多问题，并对斯大林时代的遗产进行公开的全国性讨论，这一举措才会有意义。这并未发生。赫鲁晓夫和整个统治集团热衷于防范而非开展讨论。他们打算让去斯大林化的序幕也成为尾声。形势迫使他们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进程；这对国民生活来讲已经具有了急迫的必要性。在所有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首脑以及甚至追随者被根除后，只剩下斯大林的随从开启去斯大林化。但这一任务并不适合他们；它违背了他们惯常的思维习惯和利益。他们对之只能半心半意地敷衍了事。他们揭开

---

<sup>1</sup> 原文为拉丁文“vanitas vanitatum et vanitas omnia”。

了覆盖着斯大林时代的幕布的一角，但却没能升起整块幕布。因此，由赫鲁晓夫的揭露所开启的道德危机仍然悬而未决。他的揭露造成了解脱和冲击、困惑和羞耻、混乱和犬儒主义。对于国家而言，它是一种解脱，使之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梦魇；但它也是一种冲击，让人们意识到这一梦魇曾经给整个政治体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压迫。当然对于这一点，许多曾饱尝斯大林主义恐怖统治之苦的家庭已然知之甚详；但直到现在，他们才首次被允许把它整个瞥了一眼、瞥见了它真正全国性的面貌。然而单单这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令人困惑。回忆起这个国家曾经如何无助地屈服于恐怖统治、如何温顺地忍受它，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羞耻。最后，这次令人沮丧的揭露是由斯大林的帮凶和助手进行的，他们暴露了自己橱柜里的巨大骷髅后，便立刻关上橱门，再也不说什么了。这样的事实只能造成混乱和犬儒主义。

问题之所以被这样对待，是因为它——尤其鉴于与当前政治密切相关——太过严峻、太过重大。官方去斯大林化加剧了旧裂痕，又造成了新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右翼”和“左翼”共产主义者只能敦促在全国范围内不受阻碍地清算斯大林时代的账目，并与之彻底决裂。扎根于官僚集团当中的隐秘的斯大林主义者则渴望尽可能地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治理方法和斯大林传奇。在官僚集团之外，尤其在工人当中，很多人相当反感官方去斯大林化的虚伪，以至或者几乎重新转向了斯大林崇拜，或者再也不愿听到这件事，而是希望看到整个问题被一了百了地埋葬掉。

在这些分歧的背后是这样的事实，苏联社会并不了解自己，并且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对于苏维埃知识界来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本合上的书。像一些常年患有健忘症、刚刚开始恢复过来的人那样，这个不了解自己最近过往的国家无法理解它的当下。数十年的斯大林主义歪曲已经造成了集体健忘症；而二十大用以开启恢复过程的半吊子真相正阻碍着进一步的恢复。可是，如果它的政治意识想在新的、积极的形式中发展成型，那么苏联迟早都必须对这半个世纪做出评估。

对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讲，这种情况具有特别的趣味；它为历史、政治和社会意识相互之间的密切依赖提供了一种稀少的（或许独特的）事例。史学家们常常争论，对过去的意识究竟能否影响国务活动家的智慧和普通人的政治智识。

一些人认为影响了；另一些人则秉持海涅的格言——历史什么也没有教给我们<sup>1</sup>。在阶级社会中，受阶级或集团利益主导的政治思考只有在利益所要求或允许的限度内才会从对过去的研究中获益。即便史学家的看法也受到社会背景和政治状况的规定。正常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2</sup>在一些时代，这些思想多多少少有助于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而政治思考也由此获益；在其他时代，它们则表现为强大的阻碍因素。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只要稍微超出了半开化水平的统治集团或社会，要能够正常运作，就必须具有某种令自己满意的历史意识形式，就必须具有一种意识，使统治集团或社会的大部分成员普遍坚信自己对过往（尤其是最近的过往）的看法不是一套单纯的谎话，而是合乎实际的事实和事件。没有哪个统治集团能够单靠犬儒主义过活。国务活动家、领袖和普通人都需要在主观上感到自己所代表的东西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而道德上正义的东西不能基于对历史的歪曲或伪造。尽管各国国民的思考都不免于渗透着歪曲甚至赤裸裸的伪造，但后者影响如何却取决于相应国民是否将其视为真相。

在苏联，国民在历史和政治意识方面深刻的不安构成了后斯大林时代的道德危机。自二十大以来，人民已经意识到他们曾信以为真的东西有多少是由伪造和神话构成的。他们希望了解真相，却不被允许触及它。统治者告诉他们，实际上革命的全部记录都被歪曲了；但他们却没有开放真实的记录。再例如，斯大林时代最后的重大丑闻，即所谓“医生阴谋”，已经因为阴谋是捏造的而遭到正式的谴责。但谁捏造了它？只有斯大林要为它负责吗？它服务于怎样的目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复。赫鲁晓夫曾提出，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和失算，在最近的战争中，苏联或许不会承受这样大的损失。但那些“错误”并未得到公开的讨论。1939的纳粹-苏联条约仍然是官方的禁忌。人民被告知了集中营的恐怖以及为发动大清洗而进行的诬陷和强迫忏悔。但除了某些例外，清洗的受害者尚未得到平反。没人知道，多少人被驱逐到集中营里，多少人死去，多少人被屠杀，多少人幸存了下来。类似的缄默密约围绕着强制集体化。这些问题都被提起了，但都未得到回答。即便在这次周年庆典上，大部分一九一七的领袖仍然是“非

---

<sup>1</sup> 这里指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从历史当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格言归属于谁，说法不一，或是海涅，或是黑格尔，或是甘地。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人”；大部分指挥十月起义的中央委员的名字仍然不能被提及。人民被要求庆祝伟大的周年，但他们却无法读到有关他们正在庆祝的事件的可信记述。（他们也没法搞懂内战的历史。）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已经被炸；但随着它的地基被动摇、它的屋顶被刮走、它的墙面被烧焦而有垮塌的危险，结构依然屹立；人民则被要求在里面生活。

在开始这个系列的讲座时，我曾提到持续性给苏维埃政权带来祝福和诅咒。我们已经讲过了祝福，现在来看看诅咒。在持续性的庇护下，革命的非理性方面得以和理性方面一道幸存并持续下来。它们能相互分开吗？显然，克服非理性并从它们手中释放自己的创造力，这对苏联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如今不协调的合并培育了严重的幻灭；人民由此认为，革命的悲惨或许盖过了它的伟大。这在过往的革命那里导致了复辟。可是，尽管复辟对于屈服于它的国家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和真正的悲剧，但它也能够有所弥补：它向对革命幻灭的人民表明，反动选项是如何地不可接受。回归的波旁家族和斯图亚特家族，比起清教徒、雅各宾派或波拿巴主义者，更好地教导了人民：没有回头路；革命的基本成果是不可逆转的；为了未来，必须拯救它。因此，复辟无意中使革命或至少它的核心和理性成果得到了平反。

我们知道，在苏联，革命已历经所有可能的复辟动因而幸存了下来。但它似乎负担着累积起来的巨大幻灭甚至绝望，而后者在其他历史状况中或许会成为复辟的动力。苏联有时仿佛充满了没能变成政治现实的、复辟的道德-心理潜能。这五十年中的许多记录让人民觉得非常丢脸；而且没有回归的罗曼诺夫家族来给它平反。革命必须以自己的努力给自己平反。

苏维埃社会不能长期容忍自己保持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客体，并依赖于独裁者的突发奇想或寡头的任意决策。它需要重新感觉到做自己的主人。它需要控制自己政府，并将长久以来高耸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转变为民主地体现国民意志和利益的工具。它首先需要恢复言论和结社自由。和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理想相比，这是一种极为温和的愿望；而悖谬的是，苏联人民如今将不得不为那些曾出现于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纲领（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对之加以无情的批判）当中的基本自由而斗争。

但是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言论和结社自由所表现出的职能，必须与它曾

在资本主义当中表现出的截然不同。在此几乎不必强调，即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那种自由有多么关键。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由于有产阶级几乎垄断了造就舆论的全部资料，因而普遍的财产关系使那种自由仅只是一种形式自由。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喉舌最好也只不过设法控制了边缘性的社会和政治自我表达设施。本身受到财产控制的社会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尤为大方的是，它被允许沉溺于幻想自己在有效地控制国家，除非维持这种幻想对资产阶级来说太过窘迫和靡费。在一个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中，言论和结社自由不会有这样的形式性和幻想性：它要么是实在的，要么根本不存在。财产的权力已被摧毁，只有国家（即官僚）支配社会；并且它的支配仅仅基于对人民自由地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压制。资本主义能够承受给予工人阶级以选举权，因为它能通过自己的经济机制来制服他们；即便在没有行使政治权力的时候，资产阶级也能够维持自己的社会优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制服群众的不是自动的经济机制而是绝对的政治力量。确实，官僚的一部分力量源于它在经济当中占据的不受控制的指令地位；但它也是通过政治力量维持这一地位的。没有政治力量，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社会至上地位；任何形式的民主控制都能够使它丧失力量。因此言论和结社自由有了新的意义和职能。换言之，资本主义已经能够从多条经济、政治和文化防线与自己的阶级敌人作战，这样便有充分的余地进行退却和机动。一种后资本主义官僚独裁制所拥有的余地却少得多：它的第一条防线，即政治防线，就是最后一条防线。难怪它要竭尽全力守住那条防线。

可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后资本主义关系远没有一些极为激进的批评家所想象得那样简单。在我看来，不存在任何所谓废除官僚的问题。官僚就像国家自身一样，不能简单地抹掉。专家和公务员、行政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职业集团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反映出各种技能和教育水平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以及更基本的脑力和体力之间广泛的差异和分化。这些差异和分化正在减小；它们的减小预示着这样一个时代，在那时这些差异和分化在社会层面或许会变得那样微不足道，以至国家和官僚真的消失了。但这仍然是一种相对遥远的景象。在不久的将来似乎可能的是，社会应当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公民自由，并建立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在为此而进行的斗争中，苏联人民不是仅仅重新进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曾经对绝对主义进行的旧战斗；他们更是

在追随自己 1917 年的伟大斗争。

当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世界的事件。中国那巨大且对我们来说仍然晦暗难明的激变必定也影响了苏联。由于它改善或打乱了一种革命后庞然一体的官僚结构，并且从社会深处释放出自发进行政治行动的人民力量，中国的事例或许会在苏联边境引发类似的进程。仅就她能够学习苏联的经验并避免后者的一些越轨<sup>1</sup>和差错来说，在一些方面，中国无疑比苏联更进步；并且官僚僵化对她的影响更小。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原始且落后的；而毛主义在它的仪式和崇拜中，承担着那种落后性的重负。结果，它试图向世界教授的经验对于更为高度发达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来讲，常常要么鲜有要么毫无关系；并且即便在毛主义提供了某些积极的东西的时候，其方式也常常那样严格正统，其形式也往往那样过时，以至这些积极的内容往往被人轻易忽视。并且当毛主义者试图激起斯大林主义崇拜时，他们仅仅引起苏联富有远见的人士的震惊和反感。但俄中冲突或许充分说明了一个重要教训，即不能期望无可救药地陷于狭隘国家意识和利己主义中的、自负的官僚寡头对这一或其他冲突做出任何理性的决策；他们仍然不能为一个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联合体奠定稳定的基础。

对于苏联内部的进一步演变，西方的事件将起到甚至更为决定性的（无论好坏）作用。我们在这里或许要撇开这个问题的老生常谈且更显而易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足够显然的是，冷战和国际军备竞赛严重限制了苏联国内福利的增长和自由的扩大。更为基础和困难的是阶级斗争中的僵局问题，它的形成前面已经考察过了。这种僵局还会继续下去吗？或者它只是一种短暂的均势？西方政治理论家和史学家最近越来越认同它将继续下去；许多人倾向于将之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赛的最终结果。（这一观点无疑在苏联和东欧也有拥趸。）争论正在各社会-经济和历史层面展开。

人们指出，起初对立的苏美社会结构，相互间变得如此接近，以至它们的差异越来越无关紧要，相似点倒是决定性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教授<sup>2</sup>在他的里思讲座<sup>3</sup>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并非其独具的看法。他强调指出了“有着先进工业组织的国家在结构上的交汇”，并概述了美国社会的主要交汇点：管理人员

---

<sup>1</sup> 原文为“erratic drifts”，或系计量学术语“不规则漂移”。这个词或许是指数值超过常规的变化。

<sup>2</sup>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

<sup>3</sup> 里思讲座（Reith Lectures）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从 1948 年起开始播出的讲座类广播节目。以英国广播公司高管约翰·里思（John Reith）的姓氏命名。

的至上地位，管理与所有权的分离，产业力量的不断集中及其活动范围的扩大，自由放任<sup>1</sup>和市场的消逝，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以及最后，对于不仅防范衰退和萧条而且维持正常的社会效率，计划都具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加尔布雷思教授说道，“工业技术有着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急迫要求。”加尔布雷思教授刺破了当前西方对“市场经济在苏联复兴”的一些错误想法：“由于苏联体制回归市场而使得苏联和西方体制交汇，这种趋势是不存在的。它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超出了市场的容纳范围。存在着一种可感的、非常重要的融合趋势，即在工商企业日益增长的权威之下同样的计划形式。”在这里，两种制度似乎不是“交汇于”二者之间，而是刚好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并且这里的景象不是一种僵局，而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压力平行四边形造成的对角线。<sup>2</sup>

对此，史学家们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斗争中找到了先例。作为这种类比的早期提倡者之一，巴特菲尔德教授曾指出，新教和天主教在其冲突之初，都渴望获得全面胜利；但达到僵局之后，他们被迫寻求相互和解、“和平共处”，并且满足于他们在西方基督教当中各自的“势力范围”。<sup>3</sup>同时在经历一个相互同化的过程之后，他们起初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削弱了：罗马教会通过吸收一些新教因素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新教则变得越来越具有教条性和宗派性，失去了许多吸引力，变得类似于自己的对手。僵局因此是不可打破的最终结果；我们时代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僵局也是如此——我们的史学家以及政治或经济理论家都持这种论点。

这样的历史类比尽管在某些方面令人信服，但也有它的错误和缺陷。它像许多相似的类比一样，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差别。在宗教改革时代，西方社会分裂为诸多封建的、半封建的、后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和早期资本主义的诸侯国。新教意识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民族国家为它的一体化趋势设定了外在的界限。西方基督教重新统一于单一教会之下是一种历史的不可能性。对比于此，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它的结构和冲突，在性质上是国际甚至普世的；它们趋向于国际或普世的解决方案。并且还有前所未有的危险威胁

---

<sup>1</sup> 原文为“laissez faire”。

<sup>2</sup> 引文来自《听众》于1966年12月15日刊载的加尔布雷思教授的里思讲座。——多伊彻注

<sup>3</sup> 赫·巴特菲尔德：《二十世纪的国际冲突，一种基督教视角》（伦敦，1960年），第61-78页。我对巴特菲尔德教授的类比的批评，并不减损他在1950年代勇敢地在美国听众恳求国际缓和的正确性。——多伊彻注

着我们的生理存在。这些尤其需要人类的一体化，而后者如果没有一种整合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立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但其背景却是崛起的资本主义和衰落的封建主义之间的大冲突。意识形态-宗教的僵局完全不能使这一冲突停歇下来。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范围划分非常广泛地对应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划分以及它们之间暂时的均势。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互间的竞争继续进行着，并有了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十八世纪更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意识不是通过宗教意识形态而是通过世俗主义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表达自身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僵局似乎在历史的边缘固定下来了；对于所有实际历史目标而言，它在当前社会和政治行动中都被超越了。不仅社会冲突没有停留于宗教的势力划分，而且还被进行到底。资本主义广泛采用了各种方式方法，通过来自下层和来自上层的革命，并经历了许多暂时的僵局和部分的失败，终究在欧洲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即便就这一类比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仓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对抗会终结于目前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僵局。对立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表现或许也必须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动力被耗尽或减弱了。另外，对于意识形态僵局，宗教改革的故事多次警告人们不要仓促下结论。当听说《共产党宣言》出版 120 年以来西方还没有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取胜，人们总会想起宗教改革造成的许多“不成熟”的起点，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经年日久才得以成型。路德距离胡斯有一个多世纪；而在路德和清教革命之间还隔着另一个世纪。

可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俄国革命的普世抱负难道没有因为对立社会制度的相互同化而失效吗？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程度的同化；这一方面由于现代技术超国家的均质化作用，另一方面则出乎一切使争斗各方采取相同或类似行动方法的重大对抗的逻辑。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惊人。但细加观察，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管理越来越深入地与财产相分离，管理人员的重要性，资本的集中，所有大集团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更加细致的劳动分工，市场和自由放任的日渐消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提高，以及计划的技术和经济必要性——所有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际上都是在资本主义当中得到发展的生产进程社会化的表现。社会化如今确已急剧加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这一进程时，明确预测过这些在西方分析家看来似乎那么新奇且革命性的发展和趋

势。加尔布雷思教授向我们描述的难道不是我们熟知或应当熟知的“资本主义子宫中的社会主义胚胎”的迅速成长吗？胚胎显然变得越来越大。难道因此我们就应当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必要进行分娩吗？马克思主义者将反思这样的悖论：虽然在俄国，革命的助产士在胚胎还有待成熟时便进行了干预，但在西方，胚胎或许已经发育得过于成熟（其结果或许对社会有机体极为有害）。

实际上，即便进行了各种凯恩斯式的创新，我们在许多方面已极为社会化的生产进程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控制。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与管理相分离，财产仍然控制着经济。股东的利润仍然是经济运行的主导性动力，仅仅服从于军国主义和世界反共斗争的需要。无论如何，我们的经济以及社会存在仍然是过时且非理性的。无政府状态或许不会表现为周期性的大衰退和大萧条。但从长远来看，即便这一点也不是确定的。在 1870 年普法战争之后，范围更狭隘的欧洲资本主义见识了一次类似甚至更为持久的、没有被大衰退打断的繁荣。爱德华·伯恩斯坦和他的修正主义同道们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预测是错误的。但此后很快，空前剧烈的动乱摇撼着经济，人类被引向了世界大战与革命的纪元。

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已经变得如此无关紧要，以至它们根本不会阻碍前者理性地组织自己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人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乐见此事的。但它却面临着这样的考验：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根据创造性的目标、它自身的公益来控制 and 安排自己的资源，并且它是否能够对它们予以国际和国家规模的组织和计划。我们的社会迄今尚未通过这一考验。我们的政府为了破坏和死亡而非生命和福利而进行计划，从而抢在衰退和萧条发生之前先行一步。如果例如美国政府一年不在军备上耗费将近 800 亿美元，那么我们的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股票经纪人便会沮丧地推测西方经济的前景，这一点不是毫无缘由的。对于衰退中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曾描绘过诸多黑暗图景，其中没有哪一幅能像现实正在造就的图景那样黑暗、那样富有末世色彩。大概六十年前，罗莎·卢森堡曾预测，有一天军国主义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动力；但在事实面前，即便她的预测也是苍白的。

这就是为什么 1917 年的讯息对整个世界仍然有效。在当前意识形态死胡同和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我们时代的问题几乎不能得到解决，人类生存也无所获益。

当然，如果核超级大国把社会现状当成它们的玩物，并且它们二者之一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改变它，那么这就会是终结一切的灾难。就此来讲，东西方和平共处具有一种至高的历史必要性。但社会现状不能永续下去。卡尔·马克思在谈及过去阶级斗争中的僵局时曾指出，它们的结局常常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sup>1</sup>。因永久性核遏制平衡而得到无限延长和保障的僵局一定会使斗争的各阶级和各国最终同归于尽。便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人类也需要结为一体；而这难道不是只有在社会主义那里才能得到实现吗？尽管在我们世纪的远景中，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显得尤为伟大，但对于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西方的事变仍然至关重要。

黑格尔曾经评论道，“世界历史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且“欧洲代表了世界历史的终结”，而亚洲只是它的开端。<sup>2</sup>之所以会有这种自负的看法，是因为黑格尔相信，宗教改革和普鲁士国家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顶峰；而许多既非国家也非教会崇拜者的西方人，直到最近都相信，世界历史确实在西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毫无重要贡献的东方只能成为它的客体。我们是更明白的。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如此强劲地转移回东方。但我们不必设想，它会在东方终结，并且西方将永远用目前这种保守的调子发声，给社会主义年鉴仅仅贡献几张空白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社会主义都还有革命戏剧的关键几幕需要上演；无论在何处，历史都不会走向终结。东方已经首先实行了一种新社会组织的伟大原则，而后者最初是在西方被构想出来的。五十年的苏维埃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实行这条原则，一个落后国家也已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仅凭此，这五十年便指出了无限的新前景，西方社会只要摆脱自己的保守物神，便能够为自己和世界打开这些前景。就此来讲，俄国革命仍然带着一种严峻且富有挑战性的**相关性**<sup>3</sup>面对西方。

---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sup>2</sup> 语出自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sup>3</sup> 原文为拉丁文“tua res agitur”。